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2月15日第22期 总第14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封面说明: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 《记忆》145 期

##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一）

### 【专 稿】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一）——“反干扰”时期

### 【评 论】

徐海亮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 【考 辨】

聂树人 “文革回忆录”可信度之我见

——兼评《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失实

文 研 戚本禹说：周恩来的“这个办法不行”

——对《王大宾回忆录》中有关史料的解析

### 【述 往】

万天丰 回忆“六·二〇事件”

唐国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 【书 摘】

王大宾 回忆毛主席的召见，反思对我们的批评

### 【资 料】

薄一波对北京地质学院问题的批示（1966 年 6 月 22 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 年 8 月 17 日）

### 【版权声明】

【专 稿】

##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一）

——“反干扰”时期

宋翔雁

### 写在前面的话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时最长（十年有余）、涉及和参与人数最多（从未成年的孩子到耄耋老人达几亿人口）、打击面最宽（几乎涉及到所有层面的各个阶层）、迫害方法和手段最为残忍的一次政治运动。它不仅迟滞和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它还完全否认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层面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革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异类，为文明人类所不齿。但它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却不是偶然的，因在长期的领袖崇拜和愚民教育的熏陶下，再加上阶级斗争大棒的威逼和迫害，为这一反人类政治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充足的人众。

遗憾的是，至今执政党仍不能直面文革历史。对这场由自己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因为害怕否定自己领袖的荒唐作为而影响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性，而不敢真正彻底予以否定。导致当代年轻人对当年祖、父辈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很难理解，也无法想象。更有甚者，在个别人的蛊惑下，还认为文革运动有它的合理性、必要性，应当予以肯定。更有甚者，面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所积累的弊垢，一些人还寄希望于再搞一次文革似的运动来加以解决。

为了作到以史为鉴，国人，尤其是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确实有必要回顾并写出自己亲历过的这段历史，以示后人。这不仅是对历史、对国家，也是对自己和自己家人负责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亲历者参与和看到的，虽仅是文革沧海之一粟。但众多人的回忆、反思的汇集，必可还原出整个文革的全貌和历史真实。从而为警醒国人不再狂热、不再盲从、不再重蹈历史之覆辙，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也正是我愿意回忆——我在地院文革中——这段历史的原因和动力所在。

但我在文革中毕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参与者，所闻、所见和所参与的终归极其有限。加之事过已近半个世纪，自己现在又定居国外，与其他参与者联系、交流的机会极少，能接触和促使自己回忆的资料也颇为稀缺。且因年近耄耋，加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记忆力模糊时多、清晰时少。所以，我只能说在我所写的回忆中：所述事情（或事实）是真实的，但时间、环境、相关人等细节难免会有出入。这也是我虽有参与书写回忆文革历史的心愿，但又迟迟未敢动笔的原因所在。

但在陶世龙老师的鼓励下，特别是在蔡新平同志陆续发来一些“小将”们所写的回忆启发下，我总算开始动手了。我相信，因所写的事情是真实的，故对恢复地院文革历史原貌总是有益的。至于某些细节上的模糊或差错，只会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分析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罢了。而且，如果业经发现，也欢迎读者予以指出，届时我会注意及时加以更改。

## 一、回校参加文革至“反干扰”时期

1964 年 9 月，按北京市委的部署，由北京高校教职工、中央在京事业单位职工和郊区县县的职工，共同组成农村“四清”工作团，先后按中央“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三个文件的精神，在北京市郊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以地院教职工为主体，包括个别其他院校的教工和郊区县县的少数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由李贵同志任团长。先后于 1964. 9. —1965. 8. 和 1965. 10. —1966. 5. 在通县张家

湾公社和大兴县大辛庄公社开展了两期“四清”运动。我也是该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并先后参加了这两期“四清”运动。在“四清”期间，我主要协助大队工作队队长做好资料调查、整理、核实和上报方面的工作。

在张家湾“四清”时，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孙××（在学校负责人防方面的工作，未参加二期“四清”，后调往海淀区人防部门）；在大兴县“四清”时，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后勤部门的许登士同志。二期“四清”时，主要依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开展工作，纠正了一期工作时，因贯彻《桃园经验》而带来的很多过左的做法。但当运动进入大队领导班子调整、完善阶段时，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工作团中的高校教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约于 1966 年 5 月底回到学校，下车后，工作团负责人宣布：“四清”工作队就地解散，休整两天后，所有工作队员回原所在行政单位报到，参加运动。

就这样，我从一个“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被换到了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最前线”；从一个发动群众揪斗阶级敌人的革命者（工作队员），换位为被工作队发动的群众，批判、斗争、关押的“反革命小爬虫”。当然，对两个不同的阶级斗争最前线的认识在返校时就已明确，但对运动中个人角色的转换，却是在运动进程中才逐渐感受到的。

回校后，我对当时校内的形势是一头雾水。因一直在农村搞“四清”，虽然在报上看过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的文章，但对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为何要在高校搞文化大革命等却无从知之。但凭借“四清”时先后学习、讨论、贯彻“前、后十条”和“二十三条”文件的经历，我懵懂地觉得，可能中央对文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和估计吧！

### （一）从相信到反对

休整两天后，按要求我去探工系钻探教研室报到。但被教研室负责人告知：你现已调往新成立的系半工半读教研室，应到那儿报道并参加运动。

这一变动来得突然，回校两天来，也未听同事们说起。对此，当时也没多想，问清半

工半读教研室所在地后，即前往报到。新的行政领导是原探工系副主任屠厚泽副教授，他向我作了很简要的说明，指出该教研室是为贯彻教育革命的新精神刚成立的，为今后加强实践环节，高等教育必须要走半工半读的道路。现在我们有些人也是刚从半工半读的生产现场回到学校参加运动的，目前运动正处于学习文件阶段。

到教研室后，看到参加学习的人除部分原探工系两个专业教研室、实验、实习室，和机械、制图教研室的老师外，还有好几个数学、物理、外语等原基础课教研室的老师，总计有三十多人，大多数都是年轻教师，可能是为了适应野外教学的需要吧！

6 月初教研室的文件学习内容还比较泛，虽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揭发北京市委的文章，但大家的讨论也比较泛，而且言谈也比较谨慎，很少涉及本校的事情。校内也开始有了一些揭发个别党委成员的大字报，但所涉及的问题颇为零散，也远不及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深刻。我则因离校时间很长了，对情况更不熟悉，所以在教研室的讨论中很少发言，想借机更好的学学文件，以便领会精神、把握方向。

记得好像是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为群众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呐喊、鼓噪。因我属性牛，乳名在家里就称呼为牛。故知我乳名的一位好友就半开玩笑地提醒我：你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出身，要谨言慎行，否则小心会被横扫的。但经过两期“四清”熏陶的我，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阴影，整个身心热血沸腾，要按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在阶级斗争第一线锻炼自己。对友人的善意劝告，并未当真。但文革十年的经历，这一半开玩笑的好意提醒竟一语成谶。

文革结束后方知，当时我们这类头脑简单、只有热情的年轻人（当时自己刚过 29 岁，尚属年轻人范畴），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中国政治之复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须知单凭热情、直觉、良知、正直等人品，是既保护不了自己，也挽救不了他人的。故文革结束后自己就认定：今后，只要不是外敌入侵，还是在自己的业务岗位上，做好做强为首选。这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更实际和更有利。简言之就是，面对不可改变的环境，只能去适应。当然，这种适应是有底线的，即待人以诚，行事要真。

6 月上旬得知地质部工作组进校，我从“四清”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中得到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大好事，对学校运动的健康开展意义重大。基于这种认知和感受，一天下午，我即只身前往工作组住地（学十二楼），想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教运动的精神和方向，表达自己积极投入运动的决心。

当时学十二楼的三个门均有学生守卫，除工作组成员外，一般人不许入内。当我向守门学生说明情况后，他让我稍等。请示后，将我带进一层东侧一朝阳的房间，由一位工作组的成员接待我。当我简单说明了自己的姓名、政治面目、所在单位和此行的目的后，他首先肯定了我积极靠拢工作组的态度，希望在今后运动深入的过程中，要更加坚定这一立场。然后简单、笼统地说，当前的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北京市委和各高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完全揭开，群众也未完全发动起来。地质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长期来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此，部党组按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运动。过一两天，工作组成员就会进入各个系处和基层单位，按工作组党委的统一部署，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广大学生揭盖子……。

接待谈话的时间不长，大约十几分钟，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主要是：已经认定学校党委长期来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地质学院的问题是与北京市委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的对象是广大学生。

运动一开始，我能只身前往工作组表态确实反映出当时自己经历两届“四清”锻炼后的精神面貌——按毛主席提出的五项革命接班人条件锤炼自己，做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种出自内心深处的真诚意愿和勇气，是我 29 年人生经历中从未有过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理论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之深的一种表现。

但在离开工作组接待室返回的路上，我内心却一直在想，为何把地质学院的问题与北京市连在一起呢？地质学院是部属（教育部和地质部双重领导）院校，并非市属院校呀！为何部工作组进院刚两三天，就给地院的问题定性了呢？群众揭发还没有真正开始呀！但

对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要依靠广大学生的观点，我倒是没有疑义的。

基于这种疑惑，加之自己是一名教师，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上尽管自己真心要求进步、靠拢组织、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过去总与教研室里的一些党员存有歧见和争议，不点名的被批为只专不红，甚至被撤去教研室团支部负责人的职务。此外，在个人问题的处理上，一直以来我对一些人的异议始终认为是成见而不予理睬，从而导致和一些人关系的疏远。所有这些让自己不得不承认，如若像农村“四清”时搞阶级排队的话，我肯定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我意识到，自己今后在运动中应当谨慎，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既非党员和出身好的群众，又非学生，既要听工作组的话（他们代表党的领导），又要注意谨言慎行。当真遇到自己看不清的问题时，应注意向工作组的人员请教，避免犯错误。真正实现在运动中锤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名合格接班人的愿望。

此后，随着工作组在全院大会上点名前党委书记、院长高元贵，批判其长期来不进地质部汇报工作，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罪名后，霎时间大量的大字报就指向了在地院有深厚基础和人望的高院长身上。

但工作组对高院长的这种指责却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那是在 1958 年国庆前的某一天，我们团支部组织了一次访问何长工部长的活动。在那次访问座谈中，何部长除讲了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艰苦奋斗和在反围剿时受伤的经历，以及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外，还专门讲到：为了加强地质教育、培养地质人才，最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了不起的老干部当你们学校的院长，他不仅是老干部，他还是一位大学生呢！这在我党老干部中所占比率是不高的，说明党对地质工作和地质教育的重视，你们要很好珍惜，努力学习。当时，何部长讲话的语气和表情（如，是请来而非派来，不仅是老干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等）很真诚也很亲切，让我们这些当时还未见到、没接触过新院长的学生们，在脑海里留下了既深刻又美好的印象。而八年后的今天，同样出自何部长和工作组之口的高院长竟成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这种评价上的反差所带来的冲击，让我的思想认识很难立马跟上工作组所定的调子。



加之，因苏联专家奥斯特洛乌斯科来校指导探工系的科研工作，我自 1958 年 11 月中起，被调离学生班，从密云基地（当时因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需要，地质学院在密云建立了勘探密云铁矿的基地，探工系 54 和 56 级的学生均在此进行钻探工作）调回学校，和钻探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起听专家讲课，并跟随专家从事科研工作中的试验和相关辅助工作。在 1960 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就留校工作了。在与专家一起从事科研试验或留校当老师后，我与高院长虽没有什么单独交往和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但和学生时代相比，听院长讲话、开座谈会等机会，却明显增多。他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作风，他对知识分子、教授、老教师的尊重和对年轻教员群体的亲切态度、期望，在广大教师心底里构筑起很高的人望，引来了广大教师真诚的尊敬和爱戴。由于这种心境和上述反差所带来的冲击，更拉大了我与工作组情感上的距离，使我对工作组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我当时处于一种矛盾焦灼的心态，自己一时也难以理清。

当时内心里的一个声音是：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校，满脑袋充塞着工作队是代表党来领导运动的。而且，工作组领导也在全院大会上宣称自己是党中央派来的。所以，要想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跟工作组保持一致，不能动摇；而另一个声音则是：一个在教育改革中，自身坚持在教改第一线领导工作，甚至不辞辛苦下班听课，抓教学内容的精简；一个如此勤奋工作，和大家又极其亲近、并被众人爱戴尊敬的院领导；这样的领导怎么会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人呢？而且，高校的教育改革一直是在高教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是高教部提出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成？

在这种心境下，6 月中旬某日午休时，王大来同志到西一楼宿舍找我（我们是大学同年级同学，他后因半脱产搞团的工作而比 54 级同学晚毕业一年。这次是因系里在揭发原探工系总支书记王虹时，被点名要求回校交代、揭发问题的。当时他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对象，已被组织上派往北京市房山县官道公社任公社党委书记）。除看望外，他还问到目前学校和教研室的情况及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因我们是老同学，彼此关系较近，而且，他对人真诚，勇于担当，我对他比较信任。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前两天去找工作组表态，和眼下的矛盾心态都向他作了倾诉，想听听他的看法，求得他的帮助。此外，也向他简单介绍了教研室目前的情况。

这次相见他讲了很多，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肯定我通过“四清”思想上有很大提高，头脑里有党的领导这根弦了。找工作组表态没有错，但要注意当前的斗争形势是很复杂的。比如你从“四清”中懂得了“二十三条”与“前、后十条”有很大区别，反映出上层领导对“四清”运动的性质、打击对象、依靠对象和工作方法等，在认识上、做法上存有差异。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先后有“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两个文件，二者对运动的性质、打击和依靠对象和运动如何展开等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中央对北京市委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就可看出。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内心中存在的疑惑十分肯定的说：应当很好的深入想下去，从这里就可以看清楚当前工作组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还是画框框发动群众？最后，他建议我可以在教研室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因为，有你这类疑问的人，在教师中绝非少数。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文件就应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掌握和理解文件精神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如果大家同意，你可以把这些疑惑都整理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 （二）探工系老师们的第一张大字报

大来与我的这次长谈，结束了一段时间来我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坚定了紧跟毛主席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当日下午在教研室的讨论会上，我就谈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对工作组刚进院没几天，广大学生和教职工尚待更好发动的形势下，就定性宣布高元贵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觉得很不妥当，与毛主席关于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的思想不符。此外，我还提到：地院并不是市属院校，它接受高教部和地质部的双重领导。高等教育方面的事，更多的应当是来自高教部的旨意。现在工作组说高院长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不就等于说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高教部制定的，地质部与此无关。

现在，地质部工作组是否要借揭批高元贵，进一步揭发高教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呢？

我的发言，引起了好几位老师的共鸣，他们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疑惑和问题。会后，大家推我把大伙儿的发言整理出来，晚上再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根据大伙的意见，我整理成七八个问题，写成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底稿。晚上，我还约了王大来到钻探教研室工具实验室一起参加讨论。到会的有三十多位探工系的老师，大多是年轻教师，但也有个别教研室的主任和辅导员到会。讨论时，大家的发言远较下午开会时激烈，但都认为大字报以提问的形式写出较好，并建议问题可提得比较尖锐，但对立的情绪要显得缓和一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参与讨论的老师们的，其内心深处还是有相当顾虑的。

我遵照大家的意见，尽量简明地列出了十个问题，大家讨论通过后，大来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后请张希浩老师抄写成——《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这也是文革运动中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的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

大字报写好后已是第二天凌晨（大约是 6 月 15 日或 16 日），同意大字报观点的都纷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印象中签名人数不少于 30 人，现能回忆起的人有：王大来、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和我。

签名后，大家一起前往大饭厅前，选了一处比较明显的地段（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将大字报贴好。我记得在我们大字报的东侧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的大字报，题目虽然忘记了，但也是针对工作组的，彼此正好相互呼应。

就在我们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或第二天），工作组在全院大会上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散会后，工作组领导和李人林等人在会场（大饭厅）外被众多师生围住，受到大家的质询。尽管当时我处于圈外较远的地方，但我也参与了这场质询（后在反干扰时期，就被称为“围攻”）。当获得提问机会后，我就将大字报中提出的十个为什么和盘端出。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后，都得到在场群众的响应和支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面对这些提问，工作组领导或李人林均未回答，也未承诺回答。只是一味强调：我们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

领导运动的，高元贵停职反省是工作组党组决定报部党组批准，并得到国务院工交办支持的。希望大家要相信工作组。

在我的记忆里，整个向工作组领导质询的过程中，有两点是值得提出的：（1）应当说，面对众多的问题质询和群情激昂的人众，工作组的领导和李人林等人尽管对所提问题均取回避态度，不做正面回答，但他们讲话的言辞还是比较中性、比较平和的；（2）质询过程中没有遇到持相反观点群众的阻挠或干扰，尽管在已贴出的大字报中，可明显看出支持和反对（或怀疑）工作组人群都有。

### （三）“六·二〇”事件

6月20号清晨8点上班前（即在教研室开会），院内的大字报仍是围绕工作组在大会上所定的调子在争论，而且无论从论点还是从气势上看，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明显占了上风。从教师们互相介绍大字报的情况里，也明显可以感到，大家对反对、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更加关心和注意。但对双方大字报能明确表态赞同或反对的声音，在教师群体中还是少数。正当大家议论时，有人到教研室来说：李贵在大饭厅前讲话揭发工作组呢（当时教研室的运动仍处于按部就班的状态下，即按平时上下班时间开会、学文件、讨论、交流大字报揭发的问题，或留出一些时间让大家看看大字报，再回来交流等）！听到这一信息后，我立即建议让大伙儿去看看实际情况。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故教研室运动领导小组即决定上午的会到此结束，下午再说。

但当我们赶到大饭厅前广场时，李贵同志已不在现场了。我从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议论人群中了解到：李贵等人昨晚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了当前学校运动中存在的异常情况。明确指出工作组进院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地院党委存在的问题。相反却遏制了工作组进院前群众大胆揭发院党委中个别领导人工作和作风上存在问题的大好形势，扭转了继续深入揭发的方向。同时，还有意诱导群众将运动矛头转向现院长高元贵同志，这引起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不满。

得知这些情况后，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觉得李贵同志不愧为一名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老干部，发现问题能立即向上级反映，以便能尽快得到解决。结合“四清”期间与他接触中留下的良好印象（“四清”期间，我经常去公社所在地送交材料或汇报情况。有一次李贵同志在场，汇报后他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呀！说毕，他大笑，并说：我还不知道你是走来的，我是问你走哪条路来的。当他听我说完后，很严肃地说道：以后你来回不要走同一条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来回路径的规律，要早出早回，不要走夜路。思想上要有所警惕。同时还讲了一些解放前他在敌后斗争时期，因出行不注意而造成的损失和牺牲。这次谈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是无时不在的），也很自然地将自己拉向了李贵同志一边——一定要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和李贵同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后来看到很多师生员工（以学生为主）正在院内举行支持李贵同志革命行动的游行，我也立即加入了游行队伍，奔赴学12楼工作组驻地。在游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工作组领导人邹家尤同志不得已从学12楼出来了。能让自视为运动领导者且说一不二的工作组领导人屈身以就，在桃园东侧马路边与游行群众见面，并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革命群众的不小胜利，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六·二〇”革命群众反工作组的游行和集会，在工作组同意群众可以继续前往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的要求后散去。让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党中央派来领导运动的、是和大家站在一起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意见的工作组，在用美好言辞敷衍广大革命群众的同时，已在磨刀霍霍，准备把运动的大方向立即转向敢于对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了。

#### （四）第一回合镇压——“反干扰”

“六·二〇”游行的第二天，工作组在地院大饭厅召开了全院大会。由计委工交办主任李人林牵头，地质部的主要领导人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仪等全都到场

坐镇。为了标明自身的正统性，给自己壮胆，会议一开始就首先传达了薄一波副总理关于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大意）：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领导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六·二〇”围攻工作组是少数人闹事，是反革命事件。

紧接着邹家尤就宣布：撤销高元贵党内外一切职务，下一步运动的中心是反干扰，要揪出地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组的黑手。从而将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大方向完全转向了广大师生员工，展开了对地院广大革命群众第一回合的疯狂镇压。

动员会后的当天下午，探工系的教师职工就在工具试验室举行批判会，对《这是为什么？》大字报和主要参与、组织者们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在系核心组事前作工作的基础上（这是我个人据过往经验的估计。因大会后，我看到系核心组的人正与几位大字报的参与者在实验室前的场地上谈论呢），部分大字报参与者也积极配合，痛哭流涕地做检查，悔恨自己上当受骗，干扰了运动大方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当会议气氛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和几个被内定的黑干将们就被一一点名，并要求站起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由于会议参加者几乎都是系里的教师和职工，加之会议室较小，到会的人数不太多，所以会议的进行还比较文明，没有推搡、按头、搞“喷气式”等不文明的批斗行为，故我称之为“批判”而非批斗。

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因一小插曲导致“批判会”有点走火。即，当时个别大字报的参与者，建议发表一个检查、认错申明，否定原先《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借以挽回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这可能出自建议者的真诚认识和悔恨，当然，我认为也不排除含有个人的些许私念，借此减轻点自己的罪负。

因对该建议不好指责什么，故获得了很多大字报原参与者的响应和支持。但因系里的这次批判会王大来同志并未到场，故他不可能对此事表态。面对这一情景，我只好表态说：发表申明检查认错，我也同意。但希望能找到王大来同志，在确认他的态度后再发！这样，就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即，探工系只有王大来同志一个人不肯认错（因王大来同志并未住在学校院内，他家在中关村科学院的宿舍区）。

此言一出，得到很多参与者的认可，但反对者也颇占比率。在意见相左的争执中，个别情绪激动者语言带粗的呼喊也随之而出，但毕竟没有出现肢体接触现象，故我仅视其一插曲而已。反对等待找王大来同志的人们能讲得出的理由依就是：“我们的错误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能再为等一个人而延误时间了”。这个理由确实有相当的“感召力”，让一些认可我的观点的同志有些两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在那个年代，“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切要求进步的年轻人行为准则的标杆。它既可以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的制高点，也可以是党的干部用来压制不同意见的、做到舆论一律的有效武器。

在当时较为混乱的情况下，我即约戎信同志（他与大来同班毕业）一起退出，让他立即去找王大来同志告知情况，并速来学校。同时，我也请他转告大来，说我准备签字认错检查，并承担责任。事后得知，双方的争执最终还是对同志负责的理智略占上风，同意在得知王大来同志的表态后，再贴出认错声明的大字报。这一结果确实让我感到欣慰。

这是我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批判），也是生平第一次公开面对数十名群众上纲上线的批判。但当时我并无畏惧感，内心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与当时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因为，尽管我经历过“肃反”、“反右”、“反右倾”等运动，甚至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过两届“四清”运动。但思想上对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由进行的历次运动，给涉及到的整肃对象所带来的悲惨遭遇，并无真正的了解和认知。也就是说，历次运动受害者的恐怖而悲惨的真实人生遭遇，在长期正面灌输的宣传环境下，年轻的后来者是很少能知情的（除本人的亲属或家属外）。因此，年轻人思想、政治上的单纯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每次运动都不乏后继者会落入新一轮的整肃对象群体，使“地、富、反、坏、右”这一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得以永续。内心压力还不太大的另一原因是，与我面对的批判者主要是过去的同事，对方也都是教师，批判过程除上纲上线的一些套话外，所用语言基本上还是比较与人为善的、文明的，尽管个别人也不乏使用当时的流行用语，诸如，上串

下跳、恶毒攻击、态度嚣张、阶级本能决定的……。

大约工作组领导对这次批斗会的效果不甚满意，继而几天后又组织全校教职工，在教工之家对反工作组的教职工进行批斗。批斗会的声势很大（教工之家已被挤满，估计有数百人之多），主席台上挂着批斗大会的横幅，房柱和墙壁上贴了很多“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志性标语。

这次批斗除了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和强制性地按头以示接受批判和认罪外，也未能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其中有两个小插曲，至今却还记得。一是当我被按下头接受批斗时，只要不继续用力按压时，我就直起身抬起头面视台下群众，这时马上就会有人继续按住我的头。如此反反复复多次后，按头者低声地对我训斥道：你要老老实实在地低头接受批斗。对此我也低声答道：低头看不到群情愤怒的场面，影响批斗效果。尽管我抗辩的声音不大，但估计主席台上有的人和台下前边的一些人能听得到。所以下边就立马就有人高喊：“打掉×××的嚣张气焰！”但绝大多数人听不到这段对话，故这一口号喊毕并无多少人迎合。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接下来的批斗中，按头人也不再使劲、持续地按着了，难道是主席台上听到我们对话的人认可了我的诉求不成？！这一插曲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被持续按压之苦，更重要的是确实让我看到了会场上的真实气氛。即除了少数人声嘶力竭地呼喊以表达对批斗者的愤慨外，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随大流地举举手臂、出出声音而已。这也是教职工群体有别于众多小将们的地方。后者在批斗会上往往是义愤填膺、激情满怀地投入，尤其在运动初期的批斗会上表现就更为突出。这与他们长期接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作驯服工具”的熏陶有关，而教职工们毕竟经历过的事要多一些，思想上的盲从性相对于小将们要少了许多。

另一插曲是，在批斗会上，结合我曾是“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成员的经历，故专门请了政治教研室的李运生老师到会参加对我的批斗，可谓用心良苦。李老师也是两届“四清”运动的参加者，在政治教研室内，是为数不多的非党人士之一。“四清”之前我们并不相识，在近两年的“四清”运动中，我们之间很少有工作上的接触，彼此间的了解可以说少



之又少。但他却给我留下一个即使走路也是斯斯文文地迈着方步缓缓而行的文绉绉的书生印象，而绝非一个能上阵冲杀的士兵。因此，对他的批斗发言我一开始就心存怀疑——他能说些什么呢？让我没想到的是，为说明在“四清”期间我就是李贵的团伙成员之一，他竟牵强附会地举例说（大意）：李贵在“四清”期间，就曾以保证春播抗旱有功为由，在1966年春耕后的全团大会上，表彰过×××。这说明×××这次紧跟李贵反对工作组、干扰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对此我只能哑然一笑了之。因这原本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如今却反被恶意的安上相互勾结的罪名，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之所以说这原本是很正面的事是因当年北京地区的春旱特别严重，大兴县地区的机井普遍因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而无法继续使用。面对如此旱情，北京市农机公司按市委要求组织了一批水泵支援各相关区县公社抗旱播种使用。但运往大辛庄公社×××大队的水泵经一天一夜的安装调试、检修后，仍然不能正常抽水。随设备下乡的技工也无计可施，想回市内找人，但又不能保证返回时间。此事令公社、大队干部十分着急。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从公社大喇叭里听到“四清”工作团让我速到××××大队有急事的通知。当时我问过我们工作队的许登仕同志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快走就是了，显得很急。当我匆匆赶到××××大队后，方知是让我帮忙，看看抗旱用的水泵能否修好。从大队部出来后，“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抗旱春播的任务很急迫，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待我们到工地后，我首先向随机技工问明了情况，看了水泵的安装、管线的连接和设备运转状态，结果确实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和异常。据此，我只好将水泵解体，以探明究竟。水泵解体后我就发现问题所在，即水泵叶轮上叶片的结构旋向和水泵外壳上标注的水泵叶轮的旋转方向反了。致使尽管技工师傅是按设备标识的转向，正确地进行了安装，但因叶轮实际上是反方向旋转的，故无法产生离心力将水排出（即抽水）。故待我将水泵重新装好后，再请技工师傅略调了一点传动中心距，将原来的普通平皮带传动改为交叉式传动。事毕，在水泵、动力设备和管线等安装均不变的情况下，再次试车就一次成功地将水从地面下四米左右的小河沟里抽上来，流入灌渠进入农田。霎时围观的众多农民喊呀、跳呀，拉着我的

手向我道谢。这一刹那农民们心坎里的真情流露，让我永生也难以忘怀。为此，大队的领导一定要留我在村里用饭。我解释再三，说明我是一名工作队员，有纪律约束，不能答应。辞行后，老乡们和干部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等我已经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离去。面对这一感人的情景，在我回驻地的路上，内心也极不平静。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在“四清”中好好锻炼、好好改造，做一个农民、工人喜欢的知识分子。此事过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我受到工作团的口头表扬。但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派我去修水泵的，事后又是谁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四清”工作团的。因我自己并没有将修水泵一事看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将它看作是一次普通的业务考察而已。在这件事上，真正让我看重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农民对我的肯定和喜爱！

在整个“反干扰”期间，除了上述两次专门组织的批斗会外，其它批斗（包括在教研室的小批判）会的印象就很淡薄了。特别要指出的是，发生在“反干扰”时期的批斗会尽管很多，但并没有将我下放到学生班中进行批斗，这也许是我还不够格吧！

但却有一张来自学生班级的批判大字报值得一提。该大字报的题名是《看黑雁翔过的道路》，署名是 71622。该大字报贴在大字报区很醒目的地方（学九、十楼前马路南侧的大字报席棚上），而且全文较长，抄写也相当工整。我发现后，立即作了尽可能的详尽的抄录，以备今后需要作答或反驳时参考。之所以要提及这张大字报，并不是因其对我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也不是它揭发出什么重大问题。事实上该大字报贴出后，不论是在“反干扰”期间，还是工、军宣队进院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或在“五七”干校抓“五一六”期间，在对我三次大的整肃中，均没有涉及到该大字报对我提及的任何“问题”。更有甚者，即使在“反干扰”时期对我的批斗中，大字报的参与者们——71622 班的小将们，也没有一人上阵以大字报中的揭发内容，对我展开批斗。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该大字报出现的怪异性，值得思考。

下面我将自己当时看完大字报后的想法和立即采取的行动公诸于世，借以说明其怪异所在。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涉及到我个人经历（中学——大学——工作）中的所有时期，

同时，还揭发了我家庭出身、个人交友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相当用心和详尽。面对大字报中真真假假的揭发和批判，我首先想到的是，学生们不可能知道我个人如此多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以抹黑为手段，达到诬陷、攻击为目的的有意编造。那么，大字报中所涉及的这些是是非非的“事实”，学生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答案只能有两个：其一，是从档案里面查阅的；其二，是从与我交往较多且比较相好的朋友处获得的。对第一种可能我当即否定了，因当时学生们还不具备查阅档案的可能性，而且档案中也不可能有那些是是非非的编造（这是当时思想上对档案的严肃性、神圣性认识决定的，时至腐败丛生的今日方知，虚假档案的存在即使在当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既如此，学生只能从比较详细知道我个人、家庭、甚至交友情况的朋友那里收集到这些情况。当然，在收集情况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学生们自身的联想和编纂。

根据这一判断，我当即认定：向调查我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学生提供虚假信息的人，肯定是钻探教研室的×××老师。因为我们不仅是中学近六年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大学近五年的同学，其中还包括一年同班。后来又一起提前留校被分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了近八年时间。此外，在学生时代我们还是十分相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外出打猎、钓鱼和野游。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曾交过书面入党申请书。支部就指定他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基于这一认定，在大字报贴出后的当晚，我就约他到西一楼我的宿舍来谈谈。

当他如约前来坐下后，我很平和地向他说明，想问问 71622 班《看黑雁翔过的道路》大字报中有关我个人和家庭情况中的一些事，是否是他向同学介绍的。对我的直率提问，他回答得比较含糊。他说：根据他们的要求，我说了一些你的情况。但他们怎么写的，我不清楚。鉴于此，我向他复述了大字报中的有关内容，建议他再仔细地去看看。与此同时，我还向他强调了三点：

（1）我父亲的历史情况，你是清楚的。说解放后被镇压，这是不存在的虚构，这样做的用心也是不言自明的；

（2）说我中学时就是小流氓，这是怎么回事？是你说的吗？若此说成立，我们彼此当

时可谓是很好的朋友，岂不也把你自己放在里面了吗？幸好，我们朋友圈里还有四、五人在京，你也可以让学生们找他们去问问，有小流氓之说吗；

（3）最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是，大字报特意将”小流氓“的说法与我个人交友一事混在一起写，其用意明眼人均会知晓。对此，我说道：对我交友一事你和有的同志有不同看法，这我有感觉。如果说我真有什么不对，为何长时间以来，你不能像过去我对你交友时有不同想法就直接向你提出那样，摆到桌面上来交换意见呢？只在背后议论，我反觉得只是成见，不解释也就罢了。但如今大字报这样的写法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去联想，难道这竟是你的意图吗？

最后，我坦诚地向他表明示：鉴于我们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后又一起留校，有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并被外界认为彼此是好友的现实，而如今因我在运动中对工作组的做法有看法提出了一些意见，因此被定性为反工作组、反党，正被批斗。这让你感到有压力，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为划清界限参与斗争，今后无论是你参与揭发、批斗，还是向调查者揭发，都是应该的。但前提是：所有的揭发都必须是真实的！而今，面对学生大字报中存在的很多不真实之处，如果是你告诉他们的，或是因他们自己误听、误想导致的，我希望你能自己去向学生们更正或指出。只有这样才是对同志、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

对于我最后的要求（向学生们指明更正不实之处），他没敢作任何承诺（这是他自身一贯存在的弱点）。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去谈什么维权问题，所以，也只能点到就是了！

用如此篇幅去写一张对我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的大字报，并非它对地院文革历史的认知有多大影响，而是想借此说明“文革”时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扭曲和伤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只能讲阶级关系，其他关系都要服从于它；“亲不亲，阶级分”，阶级感情被认定是统领人类的最高感情。在“敌对”阶级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讲阶级性，否定人性。人性论被定义为资产阶级为掩饰阶级斗争、麻痹人民的工具……。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一旦被置于“敌

对”双方时，就再也不能谈论友情，只能奋起揭发、批斗，以求自保、免被牵连。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并坚持，即使如此，做人也必须有个底线。这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即，批判时，你可以上纲上线；但揭发的必须是实情而非虚构。正基于此，对在运动中整我、批我，即或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或作了一些过头的事的人，我均能释然。但对×××而言，后来除工作上必须面对外（因后来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上的交往只有很少几次），也只是在老同学聚会时，才保持点必要的、礼节上的交往，以免其他同学误会。

在整个“反干扰”期间，我知道工作组的人对我的评价是很负面的，即他们已把我定性为态度最差的一类，诸如我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检查中始终强调自己的动机是好的等。因此对我的问题工作组是决不会放过的，有了这一估计，我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做好相应的准备。即在面对极大的压力下，面对群众的批斗，要避免态度上直接顶牛，说话时在语气和用词上都要特别注意。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对待来自群众的揭发，不要轻易反驳，但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对一切属实的揭发要一律承认，不属实的则不予承认。而且，因为事情是刚刚发生过的，不太可能出现遗忘的情况，所以不需要留下含糊的词语，免得后来生事；对来自群众的善意批判，即使有的上纲上线很高，也要注意很好听取，不可轻易反驳，免得授人以不接受群众批判的把柄。而对个别秉承工作组的意图，欲置我于死地的高调批判，应尽可能在批斗会上不直接表态，当要求必须表态时，也必须实事求是，而不能先全盘接受，待过关后再翻案。譬如，在一次批斗中硬说我之所以猖狂地反工作组，是和反动老子划不清界限的阶级本能表现。对此，我坦诚地说，一直以来我都承认存在和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怎样才能划清界限，却又存在实际困难，这成为长期困扰我的魔障和不解难题。因北京解放时，我还不到十二岁，而且，此前又长期没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具体他都做了哪些反党反人民的事情，犯了那些罪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对他，我只知道一点很笼统的情况，即他是 1924 年国共合作时，由共产党派往黄埔军校，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他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高级军官，1948 年 12 月在北平和平起义。起义后成为解放军，并赴石家庄陆军学校参加整编学习。1952 年被判劳动改造，1954

年提前释放。但因何被判刑，又因何提前释放，原因我也一概不知。而且，长期来各级组织也从没有具体向我讲述过我父亲的具体情况，帮我提高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认识。面对不了解自己生父的具体情况和问题的我，怎样求解与家庭划清界限这一难题呢？因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嘛！面对我的陈述，批斗会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看来也难于立即给予正面回答，只能圆滑地说：自己的问题还需要自己去解决，外因还需通过内因来起作用。所以在“反干扰”后期的批判中，就基本没有人再提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了。总之一句话，面对由工作组组织的群众批斗，既不能“屈打成招”全盘接受，也不能硬顶而激化矛盾、激怒群众。学会用党的政策化解可能产生的不利情况。

“反干扰”进行了大约四十天，于七月下旬收场。当时，工作组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由邹家尤作“阶段总结”，在讲话中一方面说“反干扰”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这次派工作组进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在时间上很仓促，在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问题上，特别当群众对工作组的一些部署不理解时，我们在处理上，有时也可能会有些简单、生硬，从而难免会挫伤了一些群众的积极性。这可以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今后我们也需要很好总结和学习。面对讲话中的晦涩用语，明眼人，特别是在“反干扰”中首当其冲的所谓黑干将、黑手、黑线人物们，内心却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如，被说成是当前运动大方向的“反干扰”，摇身一变而成为“是必要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变成了群众对工作组的一些“部署不理解”；甚而承认道：我们处理上可能会有些简单、生硬，……伤害了一些人的积极性等。

当时我也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巨大的“反革命”压力尽管还未完全消失，但也因各类批斗会的终止而顿觉轻松，终于觉得可以喘口气了。尽管当时对发生这种变化的因由毫无所知，但从校内外大字报的内容和来势可以看出，新一轮反对工作组的浪潮正在以更加猛烈地势头酝酿着，爆发之势指日可待！■

【评 论】

## 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徐海亮

甲午年国内外发生许多事情，一些书籍出版，一些即将出版。国庆节我在深圳巧遇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读到《王大宾回忆录》即将付印的清样文稿。无论对于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五届学生来说，还是对于出版该书稿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来讲，我都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对地院的文化革命史实，以及对于王大宾本人，都很不熟悉。但我却意外地在深圳通读了即将付梓的《王大宾回忆录》书稿清样。

该回忆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1966 年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红卫兵受命并参与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前后全部事实：朱成昭领命——王大来不同意揪彭——王大宾接触彭德怀——王大宾认为当时不该揪斗彭——戚本禹批评地院的右倾——按总理指示王大宾等百人护送彭德怀进京。这一详尽的史实回忆与叙述，廓清了以往种种传言、网文留下的模糊印象。

过去虽然听说和见到好些地院同学的回忆，包括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有密切关系的阎长贵先生的回忆、讲述，涉及到好些当事人，包括朱成昭。但这一次，我从王大宾完整的回忆里，较为准确地得知了揪彭的由来，地院学生的行动与过程，每一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中央领导、地方与军队领导的言行，学生与彭德怀接触、交谈，对他的了解、认识，特别是地院学生在这—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非常具体的史实，第一次由该回忆录全面披露，大家都可以从回忆录看到，就不赘述重复了。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重新“理抹”（四川话）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的彭德怀、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入的。加上 66 年春批判“三家村”与“燕山夜话”，当时在校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多少了解 1959 年前后党内国内发生过什么引起争议的事情，在公开或正式的场合，绝大多数人都认可彭德怀

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觉得他就是当时称呼的“三反分子”，属于敌我矛盾。这次文革运动，因一开始就祭反右倾大旗，不少内心有过对“三面红旗”模糊认识的人，在忐忑不安地跟上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形势，极个别抱有投机取巧心理的人，试图在周围的人（包括群众，或领导者）寻找可称之为“右倾”、“三反”的揭露对象，择机发难。这种特别宽泛宏大而又极其微妙的心理冲动，没有经历过 1959-1966 的人，没有认真思考的人，决非可以凭借历史文献，或后世文人刻意渲染去体会和理解的。

甚至从批判《海瑞罢官》发起摧枯拉朽的反右倾声势，也触动着早期文革派领导人的心灵。湖北的王任重把自己曾在《湖北通讯》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于是将 1962 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刊于《湖北通讯》5 月 14 日增刊之上，并刊发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陶铸同志则在中南地区的动员大会上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右倾言行作出自我批评。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

和上述情况相反，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领受了揪斗彭德怀的指示，有了为革命立大功的机会以后，一些主要当事人却出现异常的反应。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认为不应该揪彭，并为此和（造反派原第一头头）朱成昭在电话中发生了争执”（该书 48 页）；因为王大来等与彭接触后，彭“豪爽、直率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王大来等人。气氛融洽，谈得投机……王大来将记录稿交给我，请我做决定，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汇报反映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彭德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的，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斗彭德怀”。（该书 50 页）王大来在房山县参加四清后，就要求并正式调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了，运动初应学校要求回校参



加文革运动。这里王回忆的是较为间接的资讯，即他回忆的王大来汇报内容，以及阅读王大来与彭总的三次谈话记录后的想法。

但王大宾自己的回忆则是完整与清晰的第一手的资料：

1966 年 12 月 18 日，王大宾以地院东方红公社第二把手身份见到彭德怀，听说王是四川德昌人，彭一开始就回忆起长征时在大小凉山的经历来，王则讲到一解放，“我们山里的穷人就都知道您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再就是您彭德怀副总司令了。十大元帅，朱老总第一，您就排第二了。”王大宾讲的，也就是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大学生普遍知识和朴素感情。下面谈话就转入正题，他们谈到庐山会议、三面红旗，“以及当时农村浮夸风的真实情况，我对彭德怀已是完全没有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头子的警惕，而将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自己的认识都向他和盘托出。”（55 页）他俩心平气和地、坦率地交流了大量对以往基层问题的看法。王现在回忆：“我们都丧失了阶级警惕性，都不设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接着我们就谈起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肚子的事。”（59 页）“我受到了鼓舞，越讲越有劲，也好像要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似的，我一边喝茶，一边继续我的话题……”（61 页）。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了，对彭德怀充满了同情心。我决定要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不应揪斗彭德怀。”（65 页）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怀疑，革命大潮下，红卫兵领袖的王大宾当时能够有如此的清醒和水平吗？我相信王大宾的质朴，我相信当年的亲历者都会理解王当时的认识和心态。

第一，王首先是四川人，我们几乎同时在四川上中学，在李井泉治理下的四川，我们有同样的感受，王在我们心目中穷乡僻壤的“甘、阿、凉”大山农村长大，我在重庆都市长大，我们都听到和感知了那时遍及城乡的“怪话”——对四川农村形势的不理解或“右倾”情绪，那时不光是知识分子有牢骚，而且干部和工人也有“怪话”啊，也有人说“小资产阶级狂热”啊！重庆市就有领导向中央写匿名信告省委的状。就在地质学院学生接触彭德怀时分，成都街头上大字报已经公开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在 1958-1962 年期间粮食、农

村政策上的错误，对于这些问题，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在揭发，甚至一批地县级干部也在造反披露。第二，从接触地院的师生和地院的一些文革资料以来，我始终感觉到地院的造反派学生，对于文革前的党内斗争、“前文革”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关注，不那么简单。他们不是一个王大来、王大宾和朱成昭如此，也不是就针对一个彭德怀问题，去接触了“右倾”“反党”分子，他们在四川还接触了诸如刘、张夫妇、“萧李廖反党集团”，为萧、李、廖奔走平反，把许多类似四川反对李井泉极左而获罪的领导干部保护在地质学院。我曾向阎长贵探讨个中原因，他觉得相比而言，地院同学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党内政治斗争涉及到的社会下层问题，特别敏感，反应强烈。我与地院的蔡新平同学探讨这个问题，他写信回答：“关于对彭德怀同情的态度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是个问题，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个字才可以说）本来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凄惨苦日子，彭德怀庐山会议因何挨整我们当时并不知真相，如果彭老总把这事当面对你一讲，你只要是正常的人，我想一定会同情彭老总的。因此我相信，最早接触彭老总的王大来、郑文卿就是这样被打动的。后来过去的王大宾也有了同样的认识是不奇怪的。”

第三，实际上不单是一个四川，一个彭德怀。在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大潮里，许多本来是反右的运动，却偏偏冒出来群众反左的事情来。郑州“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党言川，他 66 年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 1962 年 2 月 23 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 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66 年 9 月造反派大会批判前省委书记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时，首先批判前任省委领导极左错误，同情的是 57 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反党集团”。我大学毕业

刚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个造反头头就专门告诉我：“河南最可怕的就是极左了”！河南大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甚至最初运动的发动，居然是群众性反极左，而非反极右。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要敲打造反派的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他有历史错误。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提供了四个豫籍红卫兵司令，或许是河南前文革历史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类似对过去运动的反思、言论，乃至向中央部门和毛主席上书者，在一些地方的造反大学生身上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被视为“反动学生”。

“奉旨造反”一度成为文革研讨中时尚的词汇。在王大宾的回忆中，我感到这一时尚概念似对又不对。讲对，因为地院学生确实响应了文革运动，当时确实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护送回北京，交北京卫戍区了，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内心（至少是一部分主要头头的内心），是同情彭德怀的，他们尽了努力，去保护、抚慰彭老总，参与护送的百名同学，没有一个违反当时的党纪国法，去欺凌弱勢的。这一事实和今天脸谱化去谈红卫兵青面獠牙，去研究文革，是大相径庭的。朱成昭同学看到带回京的彭德怀材料抄件，“抄后即在北京红卫兵总部核心小组间传阅了。这样很快就在地院出现了一股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暗流’”（86 页）。而且在 67 年元旦后，王大宾就在老干部李贵家里召开各联队核心成员会议，汇报了揪彭的情况。李贵和参会同志都同意——当时不应该揪彭。这样看，地质学院造反派核心同学，按中央指示和组织纪律要求揪走、护送彭德怀到京，但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完全“奉旨造反”，他们理解了彭，他们尊重历史，没有不尊重彭德怀的人格。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历史事实，决非文革后彭总被平反，才对自己的评功摆好。

有意思的是，中央文革明明知道东方红公社的核心同志对彭德怀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依然确定了主持揪彭的王大宾担任公社领导人。而造反头头朱成昭被整肃，则是因为超

越了同情彭德怀的其他原因。

周恩来还指示李先念副总理，拨款 8 万元到地院，支持地院东方红公社保护来京避难和反映问题的各地领导干部，67 年春，总理、康生和戚本禹在大会上还表扬地质学院，鼓励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讲义气呢！

如果后来的人知晓 1958-1962 年的高中、大学生当年对于国内形势有过什么讨论，如果知道大学生在城市社教、农村四清，以及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学习中，他们曾经历过的“清思想”与自我检查（好些自我检查又被记入档案，成为文革中整学生的黑材料），就会明白王大宾们“逆文革大潮而动”同情彭德怀的背景了。笔者在大一时因试图上书毛泽东言事，文革初被打成“上万言书”的反革命右派，所以注意到不少文革的典型“问题大学生”，都有探讨以往社会问题的经历，又多以左或右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应现在研讨中把文革中人性说成一片黑暗、绝对丑恶的倾向，我觉得文革现实中的种种人性冲突、人性光辉的事例并不少，在思考红卫兵领袖于普通人文革中自我心理的冲突，革命理想和现实人性的冲突，就不能不想到雨果《九三年》里的郭文、西穆尔登，想到是否存在我们批判过的超越革命名义的人道主义？这种联想本来是无意义的，1793 年的法国毕竟与 1966 年的中国是两回事。但王大宾们显示的人道，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他们的人道主义既是针对彭德怀的，也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我与王大宾认识的很晚。2009 年我去看地震后的都江堰，当地政协副主席、商会会长——颇有都江堰市“小旋风”气度的彭伟接待了我，并结识了在此安度晚年的王大宾。作为工科出身的他，不苟言笑，仿若凉山苍松。这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好学生。可能饱经风霜吧，看起来他比我认识的好些老学生干部，还要朴素，更象山里人。彭伟讲王不太愿意回忆文革，或者心有余悸，不愿去写文革记事。但是那一天我住在该市，大伙走了，王却不愿离去，他似有触动，话匣子打开，侃侃而谈文革经历，收不住嘴啦。今年国庆后，王大宾得知我读了他的回忆（在 1982 年湖北看守所的自我检查、交待基础上，开始的正式回忆与写作），就打电话给我，一再问我有什么意见，书稿有什么问题；说“一再”，是

我后来几天在太行山里盘旋，他接连打电话来征求意见，那里信号很不好，我又在汽车上，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感到他有一个“临盆”前的紧张心理，这是他几十年来在社会第一次公开“亮相”的处女作吧，他有什么担心，忧虑别人对文革中的自己不理解？他反复需要给我说明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需要强调，自己是犯了错误的，在文革中是干扰了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的。我明白，不需要像祥林嫂那样逢人就讲不该把阿毛给狼叨走啦那样去忏悔。现在人们看起来会奇怪，他为什么有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人们会说，文革压根儿就错了，你那么自责干嘛？或者，你值得做文革和毛泽东的殉葬品吗？不是，王大宾在根本上是尊重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尊重业已发生的历史的。他只是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大学生，愿意承担他本应有的那一份责任。他认为对于文革运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而不是只去谴责毛泽东。他在 1983 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中的陈述，已经表达了“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200 页）这不是在法庭上不得不讲的空话，他一直恪守了自己的承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不应负法律责任，另一些问题，他必然要终生体验、反刍，提升。

我注意到他对毛主席 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见谈话的逐步认识。这一次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在当年高校和社会上确实引起巨大反响，我们作为“事外人”，当时也是五味俱全，心里很沉重的。但是到今天，和其他同龄人相比，王大宾有他独到的体会。他一再强调是毛主席召见，不是接见。“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幼稚，何等浅薄，竟对毛主席这次谈话后就是我们厄运的开始的真谛浑然不觉！”（162 页）他引证了谢静宜新近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涉及七月事件内容，谈透了事先不给蒯大富打招呼，刻意去捅“马蜂窝”的问题。当然，也可能这是他直到读了谢静宜揭开的内幕，才彻底想明白的问题。而这也是不少想问题的人，直至今天还没有想通的重要问题！王大宾在公示这一回忆时，是认真的。他指出“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165 页），而且在时间上，他追溯到 1967 年，“作为当年东方红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165

页)“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166 页)文革高校的头头们,要简单化地把他们斥责为“反革命”显然是政治的低能和有失公道的,要他们自己承认自己“不行”,也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他们当中,内省达到王这一步的,并非很多。不少人还在怪这怪那,还想指责别人,唯独不去反省自己(乃至有人以为自己比党和毛泽东还高明呢)。我终于明白,因为我成了该书付梓前夕的第一个读者,王大宾一再打电话,就是要我明白他反思的诚意,文字有无问题?他在法庭上的陈述,他的回忆,都不是不负责任的虚伪言谈。

回忆录最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收入了王大宾前妻的记忆段落,我觉得这是本回忆录中非常触动人性的一段。我喜欢在观察历史与社会中,思考一些涉及人生和人性的小故事,我也一再见到因“文革罪案”身入牢狱者的亲人眼泪和坚强活下去的,我自信阅历和亲历,我有坚定的自持力,能面对这大千世界跌宕的人生,但仍不得不为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为我们那一代——特别是女同志支持的自强不息和细腻心灵表述打动,热泪让我无法再读下去……

本来,我是为了解我不熟悉的地质学院历史去读这本回忆录的。但我感到却有意外的收获,朴素本分的王大宾,直白地披露了自己心路历程,书中有许多细腻的一一包括他接触到的干部和学生的实际心理反映,用简单化概念化谴责文革的“大排档文字”,无法表达出来,也无可理解。可能在那凉山沧桑的木讷下,还有着我未曾理解和读到的心理活动。

希望从王大宾个案开始,我们能够借鉴心态史学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回头来看看那似乎已经消逝的历史——大家热衷的政治史。■

【考 辨】

## “文革回忆录”可信度之我见 ——兼评《清华蒯大富》一书的失实

聂树人

现在，许多人在写“文革回忆录”，连当年整人的人，也有“文革回忆”大作问世。

写回忆录，也应该算是写“史”吧，应以真实为第一要务。不夸大，不缩小，更不编造。不过，事情过了几十年，“记忆”出来的东西，疏漏、不准确，也在所难免。

写回忆录，将自己骂一顿，可能没有人说话。而事涉他人，即使实事求是地写，也很为难。大抵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有些事，无所谓好坏，到了笔头之下，不得不写。可是，你一旦写出来，就可能惹出麻烦。因为，你觉得无所谓，可是，人家觉得有所谓。稍不注意，就要得罪人。要写，就不要怕得罪人。写一半，留一半；只写好听的，不写不好听的，不如不写。至于借写“回忆录”之名，毫无事实、毫无根据地吹捧自己，挞伐他人，更是要不得。

以下，仅以已出版的几本“回忆录”为例，看看“文革回忆录”的可信度。

### 一. 1966年“国庆观礼请柬”是谁发的

#### 1、韩爱晶说，他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二司

据《清华蒯大富》一书的作者许爱晶说：

一次聚会，韩爱晶说：“1966年国庆节我已经上了天安门城楼了。我们北航‘红旗’属于二司。那个二司当时是个保守的，北航‘红旗’在里面是造反派。由于我们组织比较大，还是分给我们一张请柬，我代表北航‘红旗’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我们住进

中南海，白天上了天安门城楼，晚上在中南海岸边看焰火。”<sup>1</sup>

## 2、蒯大富说，他上观礼台的请柬来自贺鹏飞

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说：

韩爱晶问蒯大富：“你当时身为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怎么过的国庆？”

蒯大富说：“他们肯定搞鬼了，他们没给我请柬。”

韩爱晶又问：“当时社会上认为你是三司司令，就算是三司的副司令，竟然没有拿到上天安门的请柬？”<sup>2</sup>

蒯大富说：“我是从清华拿的请柬，是贺鹏飞广播要我到的静斋，他说国庆有上观礼台的请柬，是贵宾台。说给我们清华有几张，几个组织平分，给了我两张。当时我们井冈山才成立一个星期，没多少人。贺鹏飞还是挺老实的，这就很简单。我和彭伟民一起去的。”<sup>3</sup>

这才是蒯大富的真心话，实情话。

贵宾台，即位于天安门城楼前（下）的观礼台。

可是，在许爱晶所写《清华蒯大富》的同一页，蒯大富又有另外的说法：

“那肯定是三司那边陈爱莲搞的鬼，他们为了自己去，就把我的请柬给贪污了。”

如果“三司那边”不“贪污”，蒯大富不是一个人就有了两张“观礼票”？

蒯大富当时和后来，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是众多同工作队作斗争的人士中的一员。只因为王光美是清华工作队中的一员，他才引起中央的重视。而 1966 年 8 月至 9 月，引起中央重视的人并不只是蒯大富，还有很多。况且，即使他引起中央重视，他也“扶不起来”，还是众多“反革命”中的一员。以这样的身份，还幻想中央从“两个方面”给他送“观礼请柬”，蒯大富将自己估计得也太高了。

我已经在互联网上，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中，指出，蒯大富既不是三司

<sup>1</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141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sup>2</sup> 同上，第 141 页，陈爱莲当时是三司组织部工作人员。

<sup>3</sup> 同上，第 141 页。



司令，也不是“三人核心组成员”，更不是“三司的副司令”。三司自成立到结束，根本就没有“司令”这一设置。“蒯司令”，主要是蒯大富自己的炒作，当然也有他人的以讹传讹。这一点，在 2000 年以后，是连蒯大富本人都承认的。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也是认可的：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核心人物聂树人有篇文章《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蒯大富的说法与聂树人文章中宋永毅采访朱成昭得到的回答相吻合。”<sup>1</sup>

可是，到了 21 世纪，韩爱晶还是要装糊涂，一再这样发问；蒯大富还想继续炒作，而硬要往“蒯司令”这边靠。

### 3、王大宾说，他上天安门的请柬来自国务院

《王大宾回忆录》出版了，可喜可贺。在回忆录中，王大宾对于他上天安门，“很不理解”。《王大宾回忆录》第 107 页第四大段第 5 节的标题是：“我不知道，周总理、中央文革为何选中了我”。

该节的正文说：1966 年 9 月 27 日，我在地院接到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的大红请柬。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下面盖着国务院的大印。接到请柬，我就觉得不安，认为不妥，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是朱成昭呀，请柬应该发给他才对。我马上找到朱成昭，对他说：“你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这个请柬应该给你，应该你去参加。”朱成昭说：“这是国庆日庆祝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总理他们商定的名单，既然邀请你你就代表我们东方红去参加吧。写的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去的好。这样的活动，我今后有的是机会。

“9 月 27 日晚，我按请柬的要求报到后，被安排入住中南海。这时才知道，同到的还有师大的谭厚兰、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刘涛扣下了，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

“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还是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红卫兵

<sup>1</sup> 同上，第 136—137 页。

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

#### 4、聂树人说，“他”上天安门有请柬来自三司



1966年10月1日，我也上了天安门。在我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三司与〈首都红卫兵〉》<sup>1</sup>一书中，已经描述了经过。现将该描述抄录（个别地方作了点修改）如下。

10月1日，我作为三司代表，与王大宾等进入中南海，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7天。我进中南海那天是9月30日下午。记得，刚进去时，心情激动，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最高领袖居住、

（上图：我的入席证的正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了中国的核心。但是，从房子的外表上说，中南海的建筑与外面没有什么两样，大都是一层建筑，破在其次，旧，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一共进来了约1000名红卫兵，其中，北京的，都是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指派的。

那时，形势发展还很不明朗，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势力还不强大。因此，在由三个司令部指派的上天安门的人中，以一司和二司的人数居多。



（上图：我的入席证的背面）<sup>2</sup>

我们可以沿中南海的西缘北段随便走。往南，因为没有走，也不知是否走得通。刚进中南海时，就宣布有纪律，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指定的区域活动，不要乱走。

晚上，安排看露天电影。在电影开始前，江青接见大家。江青说是来看望大家，问大家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要说吃的，因为人多，就是大锅饭，大锅菜，不过那米却是地道的“小站米”，很好吃，我们以前极少吃的。菜虽然是大锅菜，但是，比起学校食堂里的大锅菜，比起劳动人民文化宫食堂里的大锅菜，“内容上”要好得多。住的，是“郎

<sup>1</sup>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sup>2</sup> 入席证上面的姓名一栏原是空的，“聂树人”三字是我自己填写的。盖的大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筹备委员会”。我在上面写的是：“1966年9月30日，乘（凭）此出席证进中南海，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铺”，和外面差不多，只是“挤”的程度不如外面。

第二天一大早，吃完饭就准备上天安门。事前，好像周总理给我们交代过，不许与毛泽东握手，因为那么多人，一个一个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受不了。

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先是站在东边城楼。等到长安街上游行开始一段时间后，才放我们过去，由东往西，依次经过天安门城楼。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时才看到，毛泽东就站在楼门前的台阶上，向大家招手致意。刘少奇站在毛泽东身后偏左的高一级台阶上，手中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摇着。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没有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大家都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举着毛主席语录，按顺序走过去。

后来听说，我们三司曾经有个别人上前，同毛主席握过手。

不久，我们就又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了。

在城楼西边，我们居高临下，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密密鸦鸦的人群在慢慢地通过。由是，我想到了我们站在城楼上的人的幸福。

离开天安门城楼后，我们又排着队回到中南海里面。按照刚进入中南海时的编制，大家在一起学习林彪、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还自由活动，在中南海进行了参观。

在中南海北门附近的小广场上，有人曾摘下几片冬青叶子，夹在语录本中，以作进中南海的永久纪念。

晚上，还是看电影。

后来，我们离开中南海往北，进入一个大院。那大院好像是国防部机关，我们就是在那里照了一个“全员相”。参加照相的，只有周恩来及其以下的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陶铸、康生、李先念、李富春、江青、谭震林、陈毅、肖华、关锋、戚本禹、杨成武，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林彪。



上图：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片断）

照片是由“轮转机”照的，约有一米长。我和王大宾站在偏右的位置。



上图：周总理等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放大片断）

后排右起第九人是王大宾，由下往上数第四排右起第八位是我。

1966 年 10 月 1 日前夕，蒯大富刚刚从泥淖中爬出，他在三司原本什么都不是，谁会送给他上天安门的观礼票？

### 5、国庆观礼“请柬”的发放渠道

韩爱晶明确，“观礼请柬”来源是二司。

蒯大富是从贺鹏飞手中得到，而贺的来源渠道，该书没有说。可以肯定的是，贺手中还有其他请柬，估计来自一司。至于王大宾说的“后来听说请柬也发给了清华的蒯大富，但被清华文革的贺鹏飞、刘涛扣下了，因而蒯大富就错过了参加这一活动的机会。”应该是王大宾“听”错了。因为蒯大富虽然没有上天安门，却是上了观礼台的。

我的请柬肯定来自于三司，我当时就在三司工作。请柬上也没有写名字，“聂树人”三字是周永璋将请柬发给我后，由我自己填写上去的。当时，上级分配给三司的“观礼票”有几十张，其中，有好几张是上天安门的，其他都是上观礼台的。除三司机关外，大都分配给了三司下属院校。

王大宾说他的请柬来自国务院，“请柬上直接写着邀请王大宾的名字，下面盖着国务院的大印”。这样看来，他的请柬与我的请柬不是一回事儿，或者，是他记错了。

从《王大宾回忆录》中的这段话“这次国庆日庆祝活动，对北京高校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组织与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还是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我们地院已变成少数派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头头中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样受到邀请参加了活动……”似乎又觉得，王大宾上天安门的请柬，与那个女同学的请柬，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邀请渠道”是统一的。那个“女同学”不可能是周总理、中央文革“选中”而邀请的，她的请柬，肯定是“一司”发给的，因为地质学院保守派红卫兵参加的是“一司”。

我和王大宾，还有其他上千人，是在一起活动的。对于我上天安门这件事，在 21 世纪，我曾同王大宾说起过。可是，王大宾不记得，甚至不相信。不过，我保留的当年上天安门的“入席证”可以为证；我和他在一起的合影，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话。话又说回来，文革初期，彼此认识，但是，却从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不熟悉，是实情。

1966 年国庆节观礼请柬的分配，已经不能靠北京市委、市政府了，因为它们都瘫痪了。此时，北京高校已经成立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学也成立有跨校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国庆观礼请柬就通过红卫兵的这几个“超级组织”顺利分配下去了。

就是“国庆观礼请柬”这样一件具体的小事，四个人的“回忆”却颇有不同。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原因”？

## 二. 韩爱晶是如何“分身”的？

蒯大富在 9 月 6 日，还是东躲西藏的“光杆”一个。在以朱成昭为首的“地质东方红”的支持下，于 1966 年 9 月 24 日，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首先是蒯大富说：

当时朱成昭、韩爱晶支持我。我们成立井冈山的时候一百人还不到。他们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早就队伍雄壮，北航“红旗”已有近两千人。我们“井冈山”红卫兵在大礼堂开成立大会，大礼堂座位一千四，朱成昭带着地质“东方红战士”，韩爱晶带着北航“红旗”战士来到礼堂，坐在会场上撑场面还有一些上地院来串联的，会场也差不多坐满了。<sup>1</sup>

时间、地点都有了。连礼堂能坐一千四，“差不多坐满了”这类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确确凿凿。谁还能不信呢？

可是，在同一本书里，下面的话又在同韩爱晶打架。韩爱晶说，“北航红旗”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20 日：“我们实行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每个系推荐两个人到院里来，加上老师和工人代表差不多 20 个人，形成核心。我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一切活动都要

---

<sup>1</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139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充分发扬民主。”<sup>1</sup>

韩爱晶又说，在 10 月 4 日以前，“石兴国是主持全面的。我在校外、在国防科委门口负责那里的斗争……直到 10 月 4 号，我们北航红旗翻身了，又搞了一次普选，才产生五个常委……这时才明确我为一把手。但决定重大问题都要召开大会、小会、全体战士会，凡事少数服从多数。”<sup>2</sup>

这就是说，韩爱晶带大量人马去清华大学支持蒯大富，根本不可能。

（1）时间上不允许。自 8 月 25 日始，韩爱晶作为“前线负责人”，到国防科委门口，坚持了 28 昼夜，去“揪”工作队负责人了。到 9 月 21 日，才结束回校。而 9 月 21 日以前，韩爱晶不可能分身，既在国防科委门口，又到清华大学去同蒯大富联系。即使他回到学校后，在短短的两天时间（9 月 22—23 日）里，工作队负责人还要作检查，他又是如何同蒯大富相识相知，而于 9 月 24 日带领大队人马，去的清华大学？

（2）领导体制不允许。在 1966 年 10 月 4 日前，“北航红旗”实行的是“20 个人”的“核心”集体领导，能允许“只是这个核心成员之一”的韩爱晶带大队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吗？况且，自“北航红旗”成立到 9 月底，工作队加于造反派头上的“右派一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除，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哪里有余力，如“地质东方红”那样去管别人的事情？当时，北航的情况与地质学院的情况相差较大，“地质东方红”不仅于 8 月 24 日将工作队的主要派出者何长工等“请”到了地质学院，还通过“8.24 大辩论”，基本上打垮了保守派。

因此，说“北航红旗”在 1966 年 9 月，如何如何支持蒯大富，难以令人相信；说韩爱晶带领大队人马到清华大学的“大礼堂”，去支持蒯大富，根本不可能。

### 三．许爱晶打扮“三司”一例

<sup>1</sup> 同上，第 140-141 页。

<sup>2</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141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在我的“厘定”下，“蒯司令”是当不成了。<sup>1</sup>许爱晶在他“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给蒯大富的另一个身份——“三人核心小组”成员。他借用蒯大富的口说：“……我当时没有队伍，朱成昭特别邀请我以个人名义参加，并要我参加三人核心小组……”<sup>2</sup>他说，“三人核心小组另一个人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宋远利”。还附上了蒯大富与宋远利在 21 世纪在一起的照片。可是，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却是“与三司副司令宋远利重逢”。一会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一会又成了“副司令”，许爱晶的逻辑好像出了点问题。

宋远利不是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一把手，即主要负责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他只是“红旗大队”派驻三司的代表。

蒯大富好与名人照相、拉关系。许爱晶在写《清华蒯大富》时，可能也深受感染。可能的情况是，当他看到蒯大富与宋远利的照片时，或者胡乱地给蒯大富和宋远利加上了什么“三人核心组”的头衔，或者觉得，蒯大富向来只与名人来往，宋远利在当时名气不大，而且一个多月后即离开了三司，因此，就立即又给他加封了“副司令”的称号。

是许爱晶对三司过于热爱，还是过于仇恨，他不断地往三司头上贴红贴黑……

如果宋远利看到这些文字，他有何感想？是承认自己是三司“三人核心组”成员呢，还是承认自己是三司“副司令”呢？还是原本就什么都不是？在文革被“彻底否定”的政治背景下，在 21 世纪，抢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也不见得是好事。

#### 四．许爱晶编造蒯大富领读“誓词”

在《清华蒯大富》的另一个地方，许爱晶又借蒯大富之口说：……大会会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sup>1</sup> 详见我发表在互联网上的有关文章及我写的《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

<sup>2</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136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许爱晶说：“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sup>1</sup>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sup>2</sup>

我对此的评价是，许爱晶写的蒯大富，韩爱晶的回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奇！！

首先，韩爱晶将时间搞错了，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誓词，是在 1966 年的 9 月 6 日，而不是 10 月 6 日；其次，是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而不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 10 月 6 日大会上；第三，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而不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在一个组织成立时，才宣读誓词的。在召开批判会时，是不宣读誓词的。10 月 6 日的大会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不可能宣读誓词。这个常识，写“五大领袖”蒯大富的许爱晶难道不知道？

韩爱晶本不是三司的人，他怎么可能参加 9 月 6 日三司的成立大会，并把蒯大富“推上去”宣读誓词呢？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江青等根本就没有到场，蒯大富又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蒯大富是否说过这话，只有他们两人知道。

显然，出于制造北航与三司“联合召开 10 月 6 日大会”的需要，就必然需要“回忆错

<sup>1</sup>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144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sup>2</sup> 同上，第 145 页。

位”。

但是，由于“回忆错位”，无论是蒯大富，还是韩爱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许爱晶说，蒯大富因为参加了 10 月 6 日大会，“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sup>1</sup>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请蒯大富自己说说，他的政治处境发生“重大变化”，是在 9 月 6 日以后，还是 10 月 6 日之后？

至少，蒯大富应该回答，“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不是 9 月 24 日成立的。如果是，那么请问许爱晶，在 1966 年 9 月，都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了，贺鹏飞都要给发“国庆观礼”的请柬了，还说，在校内“政治处境”没有发生变化，或发生重大变化；直到“参加”了 10 月 6 日大会，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说得过去吗？

## 五. 许爱晶要“厘定”什么？

1966 年 10 月 6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由三司主持的大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革转折的一次大会。

21 世纪之初，北航红旗“有人”（是谁？）回忆说，这次大会是他们和三司“联合召开”的。这算是“投石问路”。

后来，由蒯大富口述的《流沙岁月》（很可能，它不是蒯大富执笔的）中，又做了“联合召开”的“回忆”。该文借用蒯大富之口：“10 月 6 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蒯大富、韩爱晶根本就没有参加 1966 年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 10 月 6 日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我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蒯大富、韩爱晶。<sup>2</sup>

<sup>1</sup> 同上，第 145 页。

<sup>2</sup>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 57 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但2011年，许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要“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史实”了：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sup>1</sup>

韩爱晶回忆说：“……1966年1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车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座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

---

<sup>1</sup> 许爱晶，《清华井冈山》，第141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sup>1</sup>

你看，本是局外人的韩爱晶，没有参加大会的蒯大富，对“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 10 月 6 日大会这件事，情节写得多么详细！时间、地点写得多么准确，参加的人有名有姓，场景是多么宏大，会议开得多么有声有色！

可是，我要说，除过“北航红旗”的那个叫井冈山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是事实外，其它都是不存在的！这是韩爱晶、蒯大富的一次不成功的合作，是又一次“记忆错位”。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sup>2</sup>一书中，我共列出十条根据予以驳斥：

第一，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文革的依靠力量。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择，最后选中了弱小的三司（当时只有 3000 多人）。1966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派周总理以及其它中央领导参加大会，一是支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二是对大会的主持者三司以强烈的支持。大会以后，三司很快发展壮大。

其次，三司，是中央承认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一，是一个“超级群众组织”。而北航红旗，只不过是一个参加了二司的群众组织。一个次一级的群众组织“北航红旗”和一个高一级的“超级组织”三司“联合”搞活动，是不对等的。因此，是不成立的，“联合”召开大会，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常识！另外，韩爱晶是在 1966 年 9 月 29 日，在戴维堤的谦让下，才拿上了上天安门“请柬”，并在中南海呆了近一星期。<sup>3</sup>他如何“筹备”这个紧接国庆节的大会？韩爱晶自己也说：他是 1966 年 10 月 4 日才当上“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的。当第一把手，屁股还没有坐热，他如何能时隔一天，就与朱成昭联系筹备召开 10 月 6 日大会？

第三，以朱成昭的“刚愎自用”，根本不可能去找尚在参加国庆观礼的、尚不是“北航红旗”第一把手的韩爱晶商谈“联合”召开大会的事情。

<sup>1</sup> 许爱晶，《清华井冈山》，第 143 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sup>2</sup>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第 33—34 页，第 58—66 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sup>3</sup> 见互联网，戴维堤的有关回忆。

第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得提前好几天成立会议筹备组。这些，都与“北航红旗”没有半点关系。按照韩爱晶所写，如此重要的大会，却成了他在“北航红旗”办公室决定的事情，他还能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岂不可笑！

第五，到 1966 年 9 月中下旬，三司已经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本用不着“北航红旗”通过《解放军报》去探询（韩爱晶语）。

第六，10 月 6 日大会，朱成昭根本就没有到会。如果是“联合召开”，按照“北航红旗”以及韩爱晶的特点，它必然要在大会上占有一个主持大会的席位，至少，它会争得在大会上“露脸”的其他角色。可是，大会自始至终，除过井冈山发言外，人们在主席台上，看到过“北航红旗”人的影子吗？

第七，在 10 月 6 日以前，三司还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人（“地质东方红”就占了一半多人）的小司令部，既没有权，更没有势。周总理在 9 月 26 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时，还在说着不要怕自己是“少数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北航红旗”负责人、当时还不是第一把手的韩爱晶，能与三司“联合召开”这次会议？当然，北航红旗的负责人不能不知道二司的保守派真相。因此，脚踩二司，伸手三司，就成为他们权变的另一着。你三司要召开大会，邀请我，我写个稿子到大会上去念念，有何不可！而且，还可以在三司造反派主持的会议上展示我造反派的雄姿！

第八，“北航红旗”不以二司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是不忠诚于自己组织的表现，是对二司的背叛，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鄙视的投机行动，很令人不屑！

第九，在这样的大会上，不可能“宣读誓词”。韩爱晶“煞有介事”地说，他临时起意，让蒯大富宣读誓词，又从何说起？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有严格的会议议程、会议安排，岂是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变的？！退一步说，难道“联合召开”的会议，就由韩爱晶一人“临时起意”，随意说了算？

第十，当时及以后，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 10 月 6 日工人体育场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韩爱晶“厘清”的词儿一出现，就露出了他的心虚。

此外，在书中，我还引用了三司当时的参谋长路瑞宗的话<sup>1</sup>：10月6日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是由三司发起，邀请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参加，包括在北京的外地革命群众组织。北航只是我们邀请的单位。其实，当时无论韩爱晶还是蒯大富都没有那么大号召力……老蒯的被解放，是由于我们“地质东方红”两次去清华，大张旗鼓地支持他，贴大标语、演说等等，这样才一点一点的把他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解放出来。他在外面的名声大，是因为他给当时的工作队长叶林（时任国家大计委的副主任）的42封公开信。

在《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一书中我还写道：10月9日《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大会的报导：“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这里，没有写“地质东方红”代表的发言，也没有写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育延的发言。那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地质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红卫兵”属于三司，是大会的主人，而不是如“北航红旗”和“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是“外人”。因此，不能因为“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后改名井然）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北航红旗”联合召开的大会；更不能说，因为“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大会。

我现在要补充的一点是，韩爱晶说他到会后“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我想告诉韩爱晶的是，不用他在21世纪“担心”。在我们心里，中央首长肯定会来的。我这样说的依据是，10月5日下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张根成急急来到三司，说我们送给中央首长的请柬不够，还要再送三个人。于是，很快就又补了三个人的请柬。即使开会前中央首长未到，我们也不担心——他们肯定会来的！事实是，中央首长是在开会前就到了的。韩爱晶的编造没有根据。这样一来，韩爱晶的如下回忆将成笑料：

---

<sup>1</sup> 路瑞宗现在河北廊坊。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 六. 如何看待“文革回忆录”

已经出版的“文革回忆录”“可信度”是大打折扣的。对此，我的看法是：

1、可信者：其中的事实，有原始证据、原始出处，当年就没有疑问的事情，给“可信”评价。

2、较可信者：虽然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但事件“公知”，个人在事件中有特殊贡献、特殊经历的，给“较可信”评价。

3、较存疑者：事件“公知”，但个人的经历，发生的时间、地点不详，没有旁证，或旁证可疑，给“较存疑”评价。

4、存疑者：没有原始证据或出处，仅凭残留的印象。即使细节说得再仔细、再具体、再确切，也只能给予“存疑”的评价。

5、难以相信者：以“笔名”写的“回忆录”（权且如此称之），如许爱晶写的《清华崩大富》之类的书，只可以当小说或其他作品来读。

“姑妄听之”者：作者的年龄，比如当年只是几岁、十几岁的小学生、中学生，或者尚没有出生者，仅凭个人的经历或“上辈人”的“言传”或其他，写出的貌似“回忆录”的作品，给予“姑妄听之”的评价。■

【考 辨】

## 戚本禹说：周恩来的“这个办法不行”

——对《王大宾回忆录》中有关史料的解析

文 研

### 一、戚本禹说：周恩来的“这个办法不行”

《王大宾回忆录》记述了 1966 年 7 月底，毛泽东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撤离后，66 年 8 月、9 月，地院及北京各学校文革运动的形势。

王大宾说：“工作队撤走了，留给地院的只是保工作队的保守派与反工作队的造反派的对立与争辩。”

“保守派在院文革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亦是毫不退让，死保工作组，争辩斗争之激烈是未曾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想象与理解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争斗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其时保守派还实际掌握着学校的领导权，在人数上也占有多数。北京工业大学校文革负责人，保守派头头谭力夫的保工作组的著名 8.20 讲话，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一时成为保守派保工作组的代表性观点，得到保守派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反工作组造反派此时仍倍感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的压力。”<sup>1</sup>

工作队撤离的地院文革运动，受到中央上层的关注。王大宾以“毛泽东的女儿肖力与地院文革运动”一节，简述了肖力到地院调查了解文革运动情况的史实。其中亦披露了工作队撤离后，由工作队推荐安排任地院文革主任的地质系 61 级学生翁清豪的回忆：“是我接待的她，向她介绍了工作队，6.20，反干扰等地院文革中的大事。她是只提问题，作记录，从不表态。这就是我和肖力接触的过程。”<sup>2</sup>

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激烈文斗，学校的广播台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最重要的宣传工

<sup>1</sup> 《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版，19-20 页。

<sup>2</sup> 同上，21-23 页



具。1966年9月23日，地院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争夺广播台事件。

王大宾回忆，9月23日事件发生之前，“周荣鑫秘书长多次到地质学院做两派工作，要求“斗批改兵团”，工作队临走时成立的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交出工作队搞的黑材料，当众销毁或退还本人写的检查，两派联合团结搞好斗批改，并协商好，地院广播电台，两派平等使用，“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轮流使用。但“斗批改兵团”违约，才几天就不执行周荣鑫秘书长主持达成的协议，拒绝东方红进入和使用院广播台。这时，朱成昭当机立断，抓住战机作出夺取广播台的决定。”<sup>1</sup>

地院保守派与造反派争夺院广播台事件发生后，即有周恩来派吴德，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戚本禹，先后到地院现场处理这件事。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转述了时任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在其文革后的口述《十年风雨记事》中，关于他当年处理这一事件的经过：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两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总理还叫郑维山由北京军区派一支徒手部队把双方分割开。周总理派地质部的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他做‘东方红’对立面那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

我们到地质学院后，就找两派的头头来谈。我们一再派人去叫，两派的头头都不来，只让他们各派的参谋长来了。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两派罢兵，谈不拢。我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但他们根本不听。

夜晚时，有人送给我一张条子，条子的内容大意说，派关锋、戚本禹同志为联络员来解决问题。条子的署名是陈伯达。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送来了一张条子，叫我们与戚本

<sup>1</sup> 《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版，37页。

禹谈谈。我对送条子的人说：不知道戚本禹在哪里。这个人便领着我找到了戚本禹。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戚本禹又说是否可以这样，‘东方红’今晚有个大会，你代表市委主持‘东方红’今晚的大会，把那个姓邹的地质部副部长交给他们批斗一下就回去，他们只批斗半个小时。

我说是周总理让这位副部长和我们一起来的，怎么好来批斗呢？

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

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

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

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sup>1</sup>

吴德的回忆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听完后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戚本禹还说：你们是站在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一边，还是站在另一边？口气相当无理。”

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在 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 8 至 9 月，周恩来、陶铸在文革运动的前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如何处理工作组撤离后，北京各学校出现的保工作组造反派与反工作组造反派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问题上，存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与周恩来另一边的

<sup>1</sup> 《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 年 10 月版，38-39 页。

分歧与不同的处理办法。

## 二、关于 66 年 8 至 9 月，周恩来处理、指导北京文革运动的有关史料

1、1966 年 8 月 4 日成立的，保工作组的地院保守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头头程关林，2011 年 6 月 18 日写有回忆文章：《被遗忘的群体》，发表在何蜀主编的电子杂志《昨天》2015 年 6 月 30 日第 54 期（增刊）。文章披露了如下史实：

（1）“1966 年 7 月底，工作组撤走前夕，祝天惠、王秀英、程秀梅和我，应邀列席地质部党组会议。何长工主持会议，旷伏兆、胥光义、邹家尤、边固等与会。还有的人，是否有宋应、李轩，不认识。李四光部长为何未到会，也不清楚。王秀英哭着向何部长：‘工作组为什么要撤走？’4 个学生中，3 个高干子女，就我老爸是平民百姓。我并不自卑，但由于不懂礼数，只能聚神聆听。何部长长叹一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派工作组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我明白了，这是一次向保工作组的学生的打招呼会议。”

（2）“8 月上旬，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

（3）“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8 月 25 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笳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笳、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笳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我方接此调，回避工作组问题，强调向前看，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共同搞好院内斗批改。此举收效，一批人宣布退出‘东方红’。但大家已明白，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

的中央文革是支持‘东方红’的，所以大局已难以挽回。由于周荣鑫曾向胡守安和我面授机宜，所以我底气还是很足的。”

(4) “当时胡守安和我直接听从国务院、工交口、地质部领导指示，实际在指挥两派斗争中我方被动应付的多。”

(5) “1966年8月-1967年1月，我和我班‘东方红’的只与李昌平见过面。‘8.24’大辩论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我，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我：‘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笏、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6) “10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与我们第一司令部的‘老保’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年轻的红卫兵实在想不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的占首都学生中绝对多数的红五类子女，被《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一下子就打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认为周总理是支持我们‘老保’的，认为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蒙蔽，所以要见毛主席。”

2、1966年8月19日成立的，保工作组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委员阎淮，写有回忆文章：《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sup>1</sup>文章披露了如下史实：

(1) “后来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2) “8月4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

<sup>1</sup> 刊于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上册，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2月版。

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5-6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7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八八’重要成员沈如槐说：<sup>1</sup>‘显然，‘八八’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sup>2</sup>9日上午，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判派工作组的刘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

(3) “8月16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八九’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

……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

(4) “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走走形式，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在回校路上，我们车队被一辆小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 不行吗！’我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

<sup>1</sup> 1967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

<sup>2</sup>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21页。

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改成‘斗蒋誓师大会’了事。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控系一年级的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超高干子弟”的陈元和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则陈。”

（5）“‘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22 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 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6）“8 月 24 日下午 5 点半，12 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 2 万人，家属 3 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sup>1</sup>还有几百个‘残

---

<sup>1</sup> 右派归单位管理。

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 8 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

(7) “8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sup>1</sup>被公认是中央对‘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我当时更自认‘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sup>2</sup>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sup>3</sup>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 53 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的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8) “1 月 6 日下午，我和没赶上‘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晚

<sup>1</sup> 刘菊芬执笔。

<sup>2</sup>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30 页。

<sup>3</sup> 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

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后，说他清醒了，不同意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sup>1</sup>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 7 日中午。”<sup>2</sup>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公安部抓人、两派组织、揪黑风后台、批评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道陈宋阎三人于 7 日贴出反动大字报。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sup>3</sup>

3. 1966 年底，商业部部长王磊，在《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中，披露了如下史实：<sup>4</sup>（1）“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sup>5</sup>财贸领导小组提出了搞两派团结的方针，设想经过一段时间对两派分别进行说服的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这个方针是折中主义的，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在当时，我对这个错误的方针，是完全赞同的。”

---

<sup>1</sup> 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

<sup>2</sup> 引自 1967 年 3 月我的《检查》。

<sup>3</sup> 《清华文革亲历》，98 页。

<sup>4</sup> 史实：《文革中的检讨书》，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年 3 月版，152-155 页。

<sup>5</sup> 财贸口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



(2) “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上前一个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个时期执行折中主义，是反动路线的继续。我们赞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方面，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一方，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问题）。而我们赞同执行折中主义，赞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搞错了。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错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在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折中主义观点（大致同陈伯达同志指出的：‘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以后，才认识到我们的折中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就认识到当初认为刘孜如同志控制指挥着监察组，支持商学院红反军一方，是夺了曾传六同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错误的。”

### 三、1966 年《红旗》十三期社论批判折中主义，是批的周恩来吗？

1966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 10 月 10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sup>1</sup>

“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这是批的周恩来吗？

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一书中记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sup>2</sup>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

<sup>1</sup> 《毛泽东年谱》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2 页。

<sup>2</sup> 指 1966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因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召开，又称红楼座谈会。

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陈伯达对王力、关锋说：总理旗帜不鲜明，要写一篇《红旗》国庆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都参加了审定和讨论，陈伯达定稿。”<sup>1</sup>毛泽东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sup>2</sup>

毛泽东在 1967 年 1 月 22 日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sup>3</sup>

毛泽东在 1967 年 5 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sup>4</sup>

毛泽东在他认定的扭转方向阶段，可以认定包括要扭转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推行的折中主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中对此记述如下：

“过去研究文革史的人，都把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274 页。

<sup>2</sup> 《毛泽东年谱》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24 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37 页。

<sup>4</sup> 同上，88 页。

当成孤立的一件事，说因为社论一出来，就掀起一个高潮，矛头针对了老干部，而把中央工作会议看成了另外一件事。实际上批资反路线同工作会议是一回事。工作会议就是为了贯彻批判资反路线。还有人说，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经靠边站，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彻底批判资反路线？这是因为，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问题在十一中全会算是解决了。而这次批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毛主席从九月份就形成这一概念。现在历史学家把有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参加的大专院校座谈会也当成是偶然的，某某人组织的，这也不是。这个会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开的。会议本来是王任重主持的，王任重没兴趣，改由张春桥主持。会上学生发言说造反派还在受压，说周总理和稀泥、折中主义。也批评了陶铸。张春桥没怎么表态，只是说我们回去如实向中央汇报。江青听了张春桥的汇报，她说总理就是和稀泥、折中主义。会议记录当时整理出来了，有全文，江青说记录要送一份给总理，但她说不给陶铸。记录主要送给毛主席，这加深了毛主席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当时毛主席的概念，认为这两个月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成绩也很大，但领导是不力的，没有明确地对主要的对象进行批判，目标分散，不明确，不集中，没有对准错误路线，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对象，没有触动毛主席认为的旧的机器、旧的组织、旧的机构、旧的纪律，采用的是旧的方法。没有给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没有处理当时所谓的黑材料，退给本人。没有支持被认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人，没有建立新的机器、新的组织、新的纪律，没有采取新的方法，还是老的一套。各省市也是如此。毛主席的一套主张，包括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在全党贯彻执行。也就是说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很不得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sup>1</sup>

“毛主席着重讲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已经不是指五十天的斗争，而是指十一中全会后的两个月。毛主席认为两条路线斗争十一中全会后还在继续。工作组的问题解决了，撤走了，但工作组的影响并未解决。毛主席认为各地采取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工作组走了以后，如果还是旧的组织原封不动，还是旧的机器、旧的纪律、旧的方法，只是换一种形式，还是不行。工作组走了以后，成立了文革委员会、文革小组等等组织，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在自己直接领导和支配下组织了红卫兵或其他组织。他们也搞串连。原来毛主席认为是造反的组织，变成官办的组织，实际还是老组织、老办法。毛主席认为有的地方组织工人农民反对学生，保他自己那个党委，而不是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认为这一段没有支持那些毛主席认为是坚决拥护革命路线的、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是毛主席认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们继续受压制，而原来党组织领导操纵下的组织，还是成为所谓的多数。所谓革命左派还是受压制、受打击。这是毛主席的看法。”<sup>2</sup>

“陈伯达报告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思想的。<sup>3</sup>为什么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对此作了阐明。另外很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不是指十一中全会前的五十天，而是指会后的两个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针对当时继续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总理、陶铸。”<sup>4</sup>

#### 四、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始终是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文革运动中亦是如此。团结有基础，双方都不愿破裂，不能破裂。斗争因有分歧，但最终双方斗而不破裂。

---

<sup>1</sup>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 2008 年 1 月二版，409-410 页。王大宾没有参加红楼座谈会，王力回忆有误，地院是朱成昭参加的。

<sup>2</sup> 同上，412-413 页。

<sup>3</sup> 指陈伯达在 1966 年 10 月 9 日至 28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sup>4</sup>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 2008 年 1 月二版，415 页。

王力评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时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认为周总理、陶铸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期间，即八月、九月、十月三个月抓得不行，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彻底批判。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的。”<sup>1</sup>

文革运动中，毛泽东为了团结周恩来，争取他的合作与支持，对有损和攻击周恩来的极左行为，有明确的反对态度。王力说：“江青和张春桥要把怀仁堂会议的材料发到军委扩大会议，主席不同意，说文件牵涉到总理，不能发。”<sup>2</sup>

1967 年 5 月 29 日，毛泽东阅唐闻生、王海容 5 月 27 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sup>3</sup>

1967 年 10 月 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sup>4</sup>■

2015 年 11 月 20 日于深圳

<sup>1</sup>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2008 年 1 月二版，471-472 页。

<sup>2</sup> 同上，665 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版，87 页。

<sup>4</sup> 同上，129 页。

【述 往】

## 回忆“六·二〇事件”

万天丰

1966年的初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处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一所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自然会深深地卷入这一政治漩涡。自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5.16通知”之后，风云突变，一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变故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展开了起来。在6月8日之前，大家只是看看文件、一般性地议论一番而已，一切还都平静。

### 一、高元贵院长成为地院的头号“靶子”

但是1966年6月8日中午，由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率领的“文化革命工作队”（200多人，简称“工作队”）开进地质学院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质部党委宣布由工作队代行党委的职权，也即夺了党委的权。起初，广大师生都把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当作可信赖的上级领导，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不过，不久之后，大家从工作队员严肃、冷冰冰的态度中，感到了问题。工作队一进学院，学校就停止上课，天天学习文件，讨论，并要求大家揭发党委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校园内开始出现随意侮辱所谓的“右派分子”，对于过去有过所谓“右倾”言论的同志进行批判与打压，从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大家对于党委内的刘普伦，聂克、周守成和李武元等同志的批评意见比较多，在他们之中也确有一些小丑闻，而其中的一些同志正好是地质部党委一贯依靠和信任的人。但是，对院长高元贵却没有揭出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高元贵同志是1958年秋季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而来地质学院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的。他一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平等待人，积极进行教育改革

等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可以说他是从北京地质学院到后来的中国地质大学的整个办学过程中，深受群众拥护的、最实干的，对学校的主要工作——教学工作抓得最好的，自然也是最得人心的好领导。这一点在校庆 40 周年（1992 年）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大会主持人介绍到老院长高元贵时，师生员工和校友们全体起立、高声欢呼，长达 5 分多钟之久。而相比之下，在介绍地矿部、教育部和北京市领导人以及其他前学校负责人时，仅获得象征性的鼓掌。可惜的是，在此几年后，学校正在筹划庆祝他八十大寿前夕，他不幸病故了。

1930 年代，他在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1935 年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转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鲁西地委群众工作部的工作（部长是万里）。解放后，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同志时任部长。据说当时他们两人在工作中就曾有过一些意见分歧。后来，高院长被调到西安任西北建筑总公司任总经理，1958 年秋季调入北京地质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为中央 7 级干部（副部长级）。

也许正如何长工副部长（部党组书记）1966 年 6 月 16 日在宣布高元贵的主要罪状时所说的：“他三年不进地质部”，犯了目无领导的错误。其实，据后来所知，党委中的李武元和周守成等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就经常背着高元贵到地矿部去“汇报情况”。所以，何部长早就对高院长不满。在 1965 年秋季就将王焕调来当学校党委书记，从此高院长只是党委常委，负责行政工作，这其实就是部领导想整高院长所迈开的第一步。

1966 年 6 月 14 日按照工作队的安排，高院长被迫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检讨。事后，效忠工作队的、政治教研室中一些“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同志就接连猛攻高院长，写了三篇大字报来批判他，说他在做假检查，真抗拒，在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说他在保护右派分子，说他具有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世界观等等。总之，对他全盘否定，认定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有了一点舆论基础的情况下，在 6 月 16 日工作队就召开全院大会，何长工部长和国务院公交办副主任李人林和工作队负责人邹家尤副部长主持大会，宣布让高元贵院长“停职反省”。这一决定，立刻激起全校绝大多数师生的愤怒与反感！

## 二、群情激奋，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倒行逆施

6月16-19日校内不同意见的辩论日趋激烈，经常有人在看大字报的时候发表反对工作队的言论或进行小范围的演讲。工作队及其少数支持者，挥舞大棒，摆出了一副“抓右派”的架势，派人潜入群众中去收集并记录群众批评他们的言论与活动情况，以便“秋后算账”。不过，也多亏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保留那段历史中的不少细节。就这一点而言，尽管他们的动机不好，但具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记录群众反对工作队的言论，抄录大字报上批评工作队的文章，监视有关同志的活动情况等等，也算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当然他们不可能掌握群众反对工作队的一切细节。

绝大多数的师生员工都坚决反对地质部党委及其工作队的做法，认为他们是在滥用职权，在搞宗派斗争，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打击、迫害我们的高院长。正像当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说：“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执行错误路线的地质部及其工作队正好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广大群众冒着会被扣上‘反党’、‘反中央’帽子的情况下，反对工作队的的大字报和反对工作队只准批判高元贵的大字报，还是几乎贴满了学校所有的墙壁和蓆棚，成为舆论的主体，不少人还多次去国务院接待室上访。这一点，恐怕是地质部和工作队领导们当时就根本无法想象到的。

6月20日清晨，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干部、时任教学辅导处处长兼总支书记的李贵同志的带领下，教学辅导处教导员王暄堂，还有岩石教研室的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邵道乾等都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他们向上级反映了地院的实际情况，认为地质部工作队和我校的一些党委成员是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和镇压群众运动的手段，来掩盖他们自己的严重错误。希望中央派工作组来学校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的接待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公交党委派代表到地质学院了解情况，待了



解清楚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李贵和王暄堂等还约好：回来后，要发表演讲，声张正义，向群众扩大宣传。

6 月 20 日上午李贵等同志的上访行动，成为地质学院人们议论与争论的中心。这表明地质部工作队当时的做法，不仅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而且也引起了正派的革命老干部的不满。少数人的意见认为：“越级上告，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当然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等于“反党”、“反革命”。而多数群众则坚决支持李贵等同志的上访，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争论得十分激烈。

几乎与此同时，刚卸任的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和地质系政治辅导员江祖如等也分别贴出大字报，指出工作队和院党委中一些人的严重问题，认为他们在“继续蒙骗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心中有鬼”，要求“中央和新市委重派工作组来领导我院的文化革命，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这些大字报并未反对批判高元贵，但是斗争的矛头显然都是直指地质部领导、工作队和院党委中另一些当时群众认为错误较多的同志（如聂克、周守成、刘普伦和李武元等）。

### 三、“六·二〇”的演说、游行与上访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左右，王暄堂在学九楼旁发表演讲，他回顾了昨晚到当天凌晨与李贵一起商议、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我院的斗争情况，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要去汇报我院文化革命的情况，指出学校近来已经揭出党委中聂克、周守成、刘普伦、李武元、王良和王克昌等同志的许多较严重的错误，但是“为什么工作队突然要求大家只批判高元贵，企图何在？这是不是在给聂克等人开脱吗？”他还指出：工作队的一位负责人曾找李贵谈话，要求他：“关于高元贵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等人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队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在批判聂克的会议上，工作队的高部长出点子，递眼色，帮聂克的忙，这又是为什么？”

他又指出：“1957 年时何长工部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何家兵’”。他说：“谁是你的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另外，他还说明：“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家的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好李贵同志……。”他的讲话击中了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的要害，得到许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

稍后，李贵同志也在大饭厅前的桌子上发表讲话：“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的材料。他们鼓动群众斗了不少基层的辅导员。工作队还说，文化大革命可以随便斗，随便打”。他还指出：至今没揭发出高元贵有什么大问题，就让高元贵停职检查，让大家专门去批判高元贵，这是为什么？”他还说：“我豁出去这二十多年的党龄，准备好明天就牺牲。”他的讲话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当有人表示反对李贵，支持工作队时，江祖如就出来支持李贵，他特别指出：“我们对任何事物不能盲从，我们不能被‘组织’这个框框给框死了。地质部有问题就可以揭！”

有几位到李贵家访问过的同学，当场就把从李贵家拿来的一条有好多个补钉的床单，站在桌子上向大家展示。许多同学都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老干部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大家都为地质学院有这样的廉洁奉公、敢于坚持真理的工农好干部而深受感动，为他不惧工作队打击报复的英雄行为而深受鼓舞。群情激奋，许多同学都表示应该马上向工作队，向邹家尤反映我们的意见，让他回答我们的疑问。当时正好就到开饭的时间了，大家说好现在先去吃饭，同时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午饭后在西一楼北侧集合，一起去找工作队反映意见。

李贵、王暄堂当时就跟几个教员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向工作队提点什么要求？我当时正好与他们在一起磋商，就说到附近西一楼我的房间里商量一下吧。由于 1958 年李贵是湖南实习大队的大队长，王暄堂和我都是他的部下，所以彼此都较熟识，也互相信任。于是我们几个人，还有几位积极热情的同学和工厂的工友就一起到西一楼 321 室进行磋商。在讨论前，我拿了饭碗和饭票，请一位热情的工友替我们三人到职工食堂去

买饭，同时我们商量着饭后向工作队提那些要求，怎么做。等那位工友把饭打回来的时候，磨片室的傅骥师傅（他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连级干部）就说：“让我先来尝一口，小心被下毒”，他先尝了一口觉得没有任何异味，才把饭菜端过来让李贵、王暄堂和我吃（可笑的是，后来工作队在清算“六·二〇”事件时，居然有人揭发：说是因为李贵怕死，一定要让别人先尝，然后他才肯吃饭）。当时有人提出来是否可以借一付锣鼓来壮大队伍的声势。工厂的骆公正师傅立刻说我们那里有，他立刻就回去拿来。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饭后，一看楼下已经聚集了好几十人，有人还扛来一面红旗，锣鼓也已准备好。于是大家就在李贵、王暄堂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开始了游行。

为了扩大影响，当时决定先到校园西部的家属区，后到中部的学生宿舍区，然后再到校园南部学 12 楼工作队的驻地。队伍一边走，就一边壮大，从几十人变成了好几百人的队伍（后来有人回忆说：参加游行队伍的人数达两千人，我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参与。但是同情者与支持者肯定是数以千计的，占学校师生的大多数）。群众自动地排列成每横排 4 人，使得队伍显得整齐而有序。队伍沿途除了有响亮的锣鼓声之外，许多同学还自发地高呼：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等口号（在少数人研究游行计划时，并没有讨论过要呼喊什么口号，由谁来领呼）。

尽管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互不相识，但是人心很齐，随时都有人主动地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后来，在“六·二〇”之后，工作队在整肃这批参与者时，一口咬定：“六·二〇”反工作队的游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其实所谓的“组织、计划”只有一个简单设想，具体事件的进展完全是处在一种自发的、群策群力的状态。这是由人心向背所决定的。

当游行队伍到达工作队驻地学 12 楼前，群众高呼口号，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出来听取群众意见和回答问题。大家在楼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等了好几分钟之后，一位工作队员出来要求大家派代表进去谈。但是由谁当代表呢？队伍中间绝大多数

人都互不相识。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到底派谁进去的，我的印象好像是以自告奋勇、自我推荐为主，其他人附议。事后，我才知道是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去的。大家说好要把邹部长请出来回答问题，大家也好对工作队提出要求。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队伍的领导李贵和王暄堂 不要先进出，以免队伍没有了领头人。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之后，邹家尤部长终于被很有礼貌地请了出来。有几个同学就从学 12 楼后面的食堂搬来一张方桌，请邹部长登上桌子与大家见面、回答问题。老实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之前有谁经历过这种直接面对群众质问的局面呢？恐怕谁都没有经历过此种场面。所以，邹部长在登台讲话前和讲话时显得十分紧张，拿着香烟的手在不断地、微微颤抖。

当大家帮邹部长扶到桌子上、站好之后，大家就自由发言，向他提出要求。主要的内容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广播他的揭发材料（事后才知道李贵当时还没有写出揭发材料），保证李贵同志的安全；坚决要求中央重派工作队来学校；要求今天就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说句实话，邹部长当时确实无法满足大家的上述要求。他只好用婉转的口气，重申“我们部工作队是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地质部党组派来的，是代表党来领导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家有批评意见可以提，我们都欢迎……”。他也明白如果他什么要求都不答应，他是不大好下台的。所以，他最后终于同意立刻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以便化解他当前的困境。

就这样，大家就同意再次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让邹部长下了台。等候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来了三辆大卡车（现在卡车是不许载人，白天也不许进城的；可在当时，这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了），师生们就纷纷站到了车上。我当时也没弄清到底去了多少人。倒是工作队的“密探们”帮我们统计了，共有 163 人上了车。

三辆站满人的大卡车直奔西华门大街国务院接待室（在西四东侧的大街，现为国务院参事室）。该接待室只是一座小楼，院子也不太大，一下子去了上百人，再加上原来已经

有的人，整个院子就给塞满了。参事室的同志让我们派几个代表进屋去谈，其他同志就站在院子里静静等候。由于当天早晨李贵等同志刚去过，公交党委正在处理地院的事情，现在只是起到了“重申一番”的作用，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让上级领导知道地质学院的群众对地质部工作队的做法意见很大，今天在校内举行了自发的群众游行，群情激奋等情况。在向接待室的同志汇报完了后，全体同志就有序地登车回校。

6月20日的群众游行、反对工作队抛出高元贵的错误方针，要求上级领导更换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队，这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是破天荒的现象。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但是以反对上级领导派来的工作队为主旨的游行与集会，通常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这在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心目中都是这么认定的。就这一点而言，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错误领导及其方针政策的活动，其意义的确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运动群众”的结果。

在“六·二〇”前后，北京市许多高校（如北大、清华、铁道学院、邮电学院等）也都自发地发生了反对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应该说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各院校互相串通联络的结果，更没有任何人来统一领导。这与“文化大革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照笔者个人的见解来看，这也不仅仅是“刘邓司令部”上当的结果，而是党内一些领导干部长期脱离群众、唯我独尊，任人唯亲，搞宗派主义的必然结果。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既然中央要求揪“黑帮”，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先拿跟自己不和睦的、不顺眼的基层领导干部开刀，这样既排除了异己、又完成了任务，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完全不考虑他们想要打倒的同志是否真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四、工作队反攻倒算与群众的坚持斗争

从 6 月 20 日到 7 月 18 日，这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是工作队进行反攻倒算，企图像 1957 年打击“右派分子”一样，把所有参与“六·二〇”事件的人员统统镇压下去，以便实现他们预定的打倒以高元贵为代表的“走资派”的目标。他们把这场镇压称之为“反干扰”。

6 月 21 日李人林副主任（国务院公交党委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部长和胥光义副部长亲临学校召开全院大会，还带了一大批地质部机关的工作人员站他们周围或站在会场四周来“保驾”，会上他们宣布“六·二〇”事件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宣称地质部工作队是革命的，是代表党中央的。他们还宣布今后的中心任务是要“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要进行“反干扰”。另外还宣布将高元贵撤职，命令聂克停职反省。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么做是秉承了刘少奇类似的指示来办的，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与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这就是当时一些负责领导干部的错误指导思想。

为了证明工作队是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会后，工作队还特意组织了一场所谓拥护工作队的游行。由于很难组织广大师生员工来参加，他们只好组织不了解真相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游行的家属、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充数，形成了一支稀稀拉拉的、毫无生气的百人队伍。这与昨天自发举行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大游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全校的人心向背表现得实在太明显了。

尽管工交党委和地质部负责人给大家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广大有良知的群众并没有被压服。李贵 21 日晚上仍旧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继续要求党中央另派工作队来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地质系和探矿工程系等许多群众都曾分别研究继续反击工作队的做法。6 月 21 日下午安静中同志还在李人林召集的座谈会上做了一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党委内一些负责人抛出高元贵、保护他们自己的许多内幕；批评工作队很不公正的做法，只准批判高元贵，明显地在保护党委内一些犯错误比较多的人。同时还批评李人林副主任的讲话很不慎重，说他只听了一面之词，就下结论等等。

尽管群众并没有被工作队、部党委和工交党委所压服，但是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主席，许多领导干部的思路和逻辑仍旧和 1957 年反右时和 1965 年以前“四清”时的一样，那就是说“我就是党，反对我派出去的工作队就是反党”。因而，在他们领导下的各级干部都是党的化身，谁也批评不得，更不能反了，因而他们就必然要挥舞大棒，抵制群众的批评，镇压群众的正义呼声。于是他们就展开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干扰”运动，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把带头反对工作队的干部、教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召开了许多次批斗大会，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很快工作队就宣布李贵，安静中，王暄堂，江祖如，郑伯让，王大来，沈孝宇，陶世龙，李明哲，贾振远，王大来，陆炎德，张海涛，刘万翔等 13 名干部和教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实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了工作队的。

然而，时代进步了，已经不是 1957 年了。好多次的批斗会，变成了辩论会。他们本想以高压手段把敢于顶撞工作队的同志，都说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黑帮分子”，可是又拿不出什么证据。相反被批判的同志反而据理力争，不断地指出工作队保护一些跟部党委关系较密切的、但是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人，不断指出党内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批判会反而开成了揭露工作队错误的大会。例如，地质系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江祖如时，就是这种情形，弄得主持会议的工作队成员不好收场，效果适得其反。全校各种级别（院、系、室、班）的批判斗争会不知开了多少个。工作队本想利用国务院工交党委的权威和大棒，把对他有意见的干部群众统统镇压下去，但是效果甚微。

这一次完全不像 1957 年，中央一声号令，各级党组织就展开斗争，所谓的右派分子马上纷纷检讨自己、就说“自己犯了错误”，几百万个所谓的右派分子一下子就定了罪。当时，共产党和党员的形象十分高大，谁都不怀疑党组织会犯错误，党员都是真理的化身！但是，现在，1966 年，当群众发动了起来，已经揭露出党内存在很多腐败的、见不得人的丑闻时，而且当时正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家打倒“走资派”的时候，想再重演 1957 年的好戏，实在就是白日做梦了！很多领导干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当“反干扰”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在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还远不能收场的情况下，7月18日傍晚突然宣布要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工作队长邹家尤副部长以总结和动员为名，讲了一些官话，虽然还说“反干扰”是必要的。但是，突然出来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暗示了工作队犯了点什么错误，实在让大家十分奇怪，并大吃一惊。

其实，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因为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明确地否定了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派工作队到高校镇压群众运动的严重错误，并且对刘少奇说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为此，工作队不得不在表面上做一点自我批评，同时立刻把工作队“反干扰”期间所印发的材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字报选编（第1-6期）》全部收回，把反干扰期间所贴的大字报全部拆除、撕掉，清理干净，以免留下罪证。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死心，7月26日地质部保卫部还向学校政治部和保卫处布置了“内清十二条”的黑文件，要求对革命师生进行审查、排队，以便清洗。同时把即将遭清洗师生的劳改地点选定在宣化和五台等地。

7月27日以水文地质系学生朱成昭为首的“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大字报虽相当简短，但是直接触痛了工作队的要害。工作队和被他们所迷惑的一些人就立刻发动围剿。据工作队统计共有750张大字报对此进行围攻。其实，事后大家才知道，朱成昭等人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大胆的大字报是因为他与郑文卿在7月25-26日到北京大学听到了万人辩论会的情况，知道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已经宣布要撤销北大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队了。当然对于工作队到底算是犯了“右倾”，还是“左倾”的错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队一定要撤走！这是问题的要害。聂树人也在当天下午贴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长篇大字报，实际上否定了工作队反干扰的“全部战果”。

## 五、撤走工作队，建立与中央的联系



有人说，当时北京市的许多高校在6月下旬都发生了“赶走”工作队的事件。其实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而且也不大符合事实。单靠群众的力量是赶不走由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的，稍微有点不同的反对意见，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怎能赶得走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代表呢？

事后大家才知道，真正导致各校工作队撤走的原因是：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由李雪峰同志（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宣布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高校工作队的决定，并撤掉了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务。会上邓小平和周恩来都讲了话，代表中央支持了市委的决定。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显然，这是毛主席决策的结果。

尽管，上级已经宣布派到各学校的工作队应该撤销，但是工作队一直拖着不走，理由是他们要“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这样可以为他们巩固“反干扰”的成果，组织、支持他们的“革命委员会”，建成一支“永远不会走的工作队”。事实上，工作队根本就没有搞什么“整训”，或“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他们努力在学校内寻找一批继续执行他们路线的代理人。不过，最后结果当然是一败涂地。

与此同时，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以朱成昭为首，先组建了“东方红战斗大队”，后来很快就组建一个全院性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当时有一位年青的女军人经常出现在地质学院的马路上看大字报，并不断地与反工作队的学生积极分子接触，了解情况并提出建议，这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当时化名为肖力（即“小李”的谐音）。从此，地质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行动和人事安排等关键事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东方红公社很快就成为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参与的革命群众组织。该组织一开始就宣布不搞“唯成分论”。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参与反对工作队、同情和支持高元贵等革命干部的广大师生员工。可以说，“六·二〇”事件的参与者和同情者就成为“地质东方红”的群众基础。“地质东方红”在文革中是全国著名的“造反派”队伍，但是其实此队伍中的

绝大多数群众却是因为保护本院正派的领导干部而逐渐聚集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质东方红”也可以说是从“老保”队伍起家的。在文革中，1967 年初，地质学院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高元贵与李贵就是首先被结合进去的领导干部。

至于，1967 年夏季革委会进行的“反右倾翻案风”，在地院要排除异己，要打倒“高、安、郑”（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要整“二团”（即以周永章、蔡新平为首的，对于革委会紧跟中央文革的某些极左行为有意见的同志）、毒打周永章，其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进行的，也是一种“奉旨办事”的结果。

笔者认为：文革早期“地质东方红”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很快就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公开或暗中的指示与支持；文革后，之所以“被抹黑”，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哪个人不曾上过当、受过骗呢？谁敢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呢？现在回过头来看，革命热情饱满的年经学生更容易被利用或被误导。在文革早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确曾一度成为“天之骄子”，少数人还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也就跟着上面犯了错误，实际上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更是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在后来更长的时间内，他们却好像成了文革罪责的重要承担者，受到了过多、过重的处罚，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在全国的一些单位内，曾长期歧视“地质东方红”的学生，显然这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

“六·二〇”事件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独立思考而发起的一场自发性的、正义的革命行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快 50 年，许多重要的当事人已经离我们而去（这也是笔者不得不写几句的原因），但是其宝贵的、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和充满正义感的气概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的，这是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2015 年 7 月 12 日

【述 往】

##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唐国权

1966 年 3 月我们就出队了，我带着五年级的学生，到内蒙杭锦后旗冶金部的 405 地质队，进行毕业实习。矿山探区是在黄河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队部驻地在富饶的河套旁边。队上的生活还比较好，因为靠近农区，食物供应都很便宜。队上给我们提供了一顶大帐篷，我们全都住下了。

我们学生在进行了一段现场生产劳动实习之后，进入了收集专题资料阶段。这时候从报纸、广播传来了闹闹腾腾的大批判的信息，声势浩大地批判“三家村”、《北京夜话》、《海瑞罢官》。报纸上还发表了林彪请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时轰轰烈烈的舆论攻势拉开了，像是要展开一场新的斗争运动。我们也赶紧组织学生学习讨论，完全搅乱了学生实习的心情。紧接着宣传机构公布了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各个高等学校里像炸开了锅，沸腾起来了，纷纷向本校的党委开炮，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所有的学校也全都自动停课。我们也接到系里的电报，立即停止实习，回到北京。这个时候，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通知》，制订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十年大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时刻开始了。

回到北京进校一看，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什么声讨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砸烂封、资、修的教学制度，高校排挤工农兵学生，学校里学了许多没有用的东西，学制太长，要抛弃苏修的教育模式……等等。但是直接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不是很多。给老师们也贴了不少的大字报。更多的是直指教授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时候各系各班的学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有什么风雷战斗队、打狗队、

横扫牛鬼蛇神战斗队……，其中最大的是“东方红”战斗队。它是联络了几个系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6月20日由“东方红”挑头，还有部分教师和干部搞了一个小有声势的游行，控诉院领导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处级工农干部，为这个干部鸣不平，闹闹哄哄展示了这个干部的清平生活。的确这老个干部比起其他同级的老干部，廉洁奉公的多，生活非常简朴。这个事闹得很有影响，沸沸扬扬。后来把这个定成了“六·二〇”事件。

学校里乱哄哄给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高帽子游街；把“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多数是教授）、“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有的院级领导）集中劳动改造；动手打骂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家属当中的受管制分子；有工人赤卫队到教授家里任意抄家，把教授从教授住宅里驱赶到小黑屋里，抢占他们的住房。

高校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新北京市委汇报到了中央。刘少奇决定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控制住混乱的局面，整顿学校里的秩序。进校的工作组这在后来被称作刘少奇的灭火队，把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给扑灭了。这个烈火实际上是江青、康生那条线上派出的人偷偷跑到高校里煽起来的。跑来我们学校里来的就有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她直接联系的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叫王大来。后来工作组在批判王大来说，“你王大来！王大来！是大有来头”，他们确实不知道，其来头之大，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毛泽东这个时候呆在武汉，还畅游长江，看着北京的局势任其发展。刘少奇派工作组他也不表态。我们学校里来的工作组是地质部何长工第一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派出的由一个副部长邹家尤带队。几百个工作组成员分配到各系、各班、各科室都有，首先把挑头的老师、干部和学生都管制起来，重点打击的是“东方红”组织。工作组首先把党委书记王焕扶起来抓好日常工作，把瘫痪的各级党的组织启动起来，发挥党员作用。首先把矛头指向院长高元贵，把他定成为走资派，号召全院师生员工揭发批判高元贵。高元贵在师生中是有很高威信，学生们并不买账。这和北大清华不完全一样，那里是学生和教师在运动开始时，集中炮轰校党委和校长。地院到没有炮轰院党委和院长，而工作组却是千方百计的想抓出高元贵的罪行，欲置高元贵于死地。但是事与愿违，工作组没有抓到高元

贵的任何实质内容，更无从抓到学生和教师、干部的“反党、反革命”的言行（这一点和北大清华大不一样）。工作组接着就是重点调查，整材料，组织批斗那些带头闹事的，学生组织的头头和教师、干部。工作组打的是“反干扰、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对组织“六·二〇”游行的学生和干部，成了重点的批斗对象。大会小会批斗那些定性为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教师和干部。工作组共整理了几大箱“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后来被中央文革强令从地质部交了出来。工作组组员被群众追问，说这些人都是要被处理，送去劳改和劳教的，与极右分子同等对待。而对那些迫害教授的所谓“造反者”却任之不管，对受群众尊敬的院领导却不予解放，只是忙于对“反革命”学生和教师、干部进行批斗。激烈残酷的批斗大约持续了20余天。这后来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动黑暗的20天，并声言：“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把那场镇压行动，算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刘少奇（他要求人人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活该倒霉，其实所有的专制者，对不驯服，违抗秩序的闹事者都不心慈手软。

正在工作队有条不紊的组织批斗，“引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群众。在我们这个制度里，最上面的决定从来都是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唯独这次毛泽东的这一手，让各级官员意想不不到，一下子懵了，不知所措。这一下一个大翻个，工作组一个晚上从审判官坐到了被告席上。工作组长首先溜之大吉，工作组组员们群龙无首，龟缩起来。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向高等学校派工作组》，至此工作组成员们各自回到原单位，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

“东方红”组织的学生们却是不依不饶，向地质部要求让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质学院接受，地院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躲着不见，于是“东方红”发动更多的学生到地质部大院里静坐。邹家尤还是不出面，坚持了大约十天，直到毛泽东点了何长工的名，把他也列入了刘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当中，邹家尤失去了靠山，老老实实跟随着“东方红”的学生们回到了地质学院。

把邹家尤弄到地质学院，没人批判他，更没有批斗，只是叫个工人看着他，关在了小屋里，似乎就是煞煞他这个副部长的威风，让他闭门思过。到了9月份，学生们都纷纷出去到校外煽风点火，或是出外大串联。也没有人顾及到这个邹家尤，于是派个车把他送回家去了。地质“东方红”在地质部大院静坐了十天，赢得了声誉，名声大噪，在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里排到了前位，成了经常被召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接见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之一。

“东方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那些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都合并到了“东方红”，正式定名为“东方红公社”，教师里的“红教联”，干部里的“红干联”。工人中的“工人赤卫队”，也都合并到“东方红公社”里，“东方红”在地质学院里一统天下。“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经过推荐公选产生了领导机构，负责的头头是朱成昭，其次是王大宾、蔡新平、聂树人等。“地质东方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断扩大，由“地质东方红”牵头联合了一些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生先成立有第一、第二司令部），“地质东方红”派去了一个常驻的联络员叫周永璋，被人们误认为司令，他也哼哼哈哈默认，被“东方红”撤了回来。实际上“三司”只是一块牌子，没有什么作用。应该朱成昭是司令，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也从不去过问“三司”的事，也不过问“东方红”的事物。这时候他已经走向反面，暗中反对起中央文革。

此时的地质“东方红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兵团”、师大“井冈山兵团”，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五大红卫兵组织，其中，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在其本学校里都是唯一的红卫兵组织。而清华、北大、师大里都有对立派别，原本受压制、受打击时，都是一致的造反红卫兵；后来某些观点不一致，始终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倒是从统一的组织里分裂出来新派别。北航虽然只是一个组织，但是职工并没有参与，北航红旗也只是学生团体的组织。地质东方红却是大量的教师、干部、和工人都参加到里头了，形成了一个代替了原来行政机构的、全校性的权力组织。特别是各级的后勤管理部门，从处、科、室到下面的工人的班组，都是“东方红”，保持了原来的管理系统，维持了正常的运作。尤其是财务部门严格地遵守国家的规定，控制着各项经费支出，任何学生

的头头都无权去支出现金，都必须通过原来各级行政领导签字和批准才能借款和报销。整个学校都是井井有序的，环境卫生也保持着良好。表明着学校里面没有混乱，没有纷争，职工们也都是正常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到 1967 年底北京高校红卫兵渐渐地分为两大派，一个是以北航红旗为首的称之为天派，一个是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称之为地派。天派观点比较激进一些，地派观点则温和一些。这也有背景上的原因，北航红旗头头多是低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没有教师和干部，做事偏激。地院就不一样，头头多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有干部教师把握，做事就稳妥一些。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都同样接受了“中央文革”联络员们的暗示和唆使，派出人员到成都去抓彭德怀，地质先找到了彭德怀，派去的王大来直接接触了彭还谈了话，倾听了彭的诉说，他说他不反对毛主席，王大来向总部汇报，立即请示了“中央文革”，被大骂右倾。“中央文革”又责成北航红旗去抓彭。地质东方红先下手秘密把彭德怀带到北京。夜间到北京后，严格保密不向外透露一点消息，不许监护人员对彭有丝毫伤害，保护彭德怀的人身安全。第二天一早就移交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接走。北航红旗不依不饶向“中央文革”要求批斗彭德怀，“中央文革”居然批准北航要求，指示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共同组织批斗，批斗在北航大操场进行。地质东方红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成了北航红旗单独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中北航学生使用了强暴手段，彭德怀倔强，不承认反党反毛主席，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头动手打了彭德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以后成了韩爱晶判刑的一条主要的罪行。

北航红旗在许多方面与地质东方红，观点不一样，做法也迥异。例如在支持文艺界的“造反”行动方面，他们就支持以打倒“三名三高”为口号的低层人员为主体的一派，当然这派人多。三名三高则是名演员、名流、名人，高工资、高级别、高地位的少数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受压制、常挨整、常受批的演艺、创作、编导人员。东方红并不是要支持他们，但是不认为他们是打击对象。这些人在文革中更是受到迫害，甚至有的跑到地质学院里来寻求保护。例如，总政文工团以马玉涛、马国光为首的《长征组歌》全体演职员，

来地质学院演出《长征组歌》，慰问地质东方红，感谢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也是少数派。北影谢芳更是因为演过受批判的电影，再次受到打击，地质东方红的学生把她秘密转移保护起来。北航支持的七机部“915”，地质支持的“916”就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915”是以庞大的工人为主体的派，而“916”则是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派。在单位里搞文革运动，各自观点绝对是不一致的。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各单位里的“革命派”，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天”派“地”派的特点，一派激进一些，一派温和一些。尤其在几个名牌大学里更是突出，北大、清华、师大、人大里的两派对立、斗争很厉害，校园里双方的广播大喇叭大喊大骂，两派人员相见就像斗鸡一样互相攻击，各执一词，逐渐发展走向武斗。到了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刺激了这些学校的主流派，想使用强力手段控制局面，但是上面（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不支持他们那样做，强调还是要联合。时至3月，到处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没有派别斗争的学校顺利地建立起革委会。北大、清华、师大等控制学校的主流派也强行成立了革委会，但是对立面仍然坚持地对抗着。革委会里倒也给对立面留有席位，暂时的稍微消停了一段时间，进入了夏季，激烈的战斗又爆发了，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3月中为了庆祝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东方红”号召了全校的师生员工，约有两、三千人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游行式的庆祝活动。游行的途中不断地有“东方红”的支持者，推着自行车或是步行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进城之后加入了中央民委和中央民族乐团的人。令人感动的是，胡松华真实地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唱起了他在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的成名曲《赞歌》。“东方红”广播车里拉出了麦克风，胡松华在麦克风前没有伴奏的条件下，一串高亢婉转蒙古长调的引导之后，唱起了：“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立刻引起广场上、长安街上骑车人和行人注意起来。最初人们并不太相信真的是胡松华在这里唱，但是看到了的确是胡松华，又有身旁其他人传递信息，就都停下脚步围观起来。我想胡松华也是难得大白天在天安门，实地唱起他的最衷爱最动人的颂歌，不禁心潮澎湃；也可能是因为“三名三高”受挤兑，对“东方红”的



支持使压抑已久的情感突然释放；或许是看到群众的热情和爱戴，令他激动自豪。他似乎是真正发自内心，唱得无比激动，可以感觉出来他特别动情。曲终人们爆发出热烈地掌声，甚至有尖叫和欢呼。像是对大家的谢意，他回场又重复地唱了一段。这个庆祝活动别的讲话什么的，我都完全忘记了，唯独这一幕深深刻在我脑海里。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人们是傻子吃饱了撑的，还是文革煽动起来的狂热，还是因为打压以后的突然自由放松，并没有人驱赶和强迫，人们从地质学院花两个多小时步行 20 多里路来到天安门。这以后在军宣队进校，庆祝毛主席发表什么“最新指示”时，也搞游行，那好像并不怎么自愿。再后来，1969 年国庆 20 周年，我和我周围的人，完全没有热情报名参加去天安门的游行。

新组建的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东方红公社”的班底，但是三结合解放了的院级领导，有院长高元贵，党委书记王焕。地质学院虽然是“东方红”一派独统，但是“东方红”本身也非铁板一块，仍然是派中有派，被称之为“二团”的就是一批更讲究政策，更注意策略的稳健派，以有头脑的政工干部为核心，学生也多是党员干部，这些人的主心骨就是院长高元贵，和团委书记安静中，这些政工和领导干部，确实在院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里，起到重要的平衡和把舵的作用。“东方红”里还有一批激进派，这是一批最初造反的人，为首的是朱成昭，而这一批人随着朱成昭垮掉，分崩离析不成气候，在革委会里和“东方红”总部里都没有了席位。

地质“东方红”最开始的造反的学生头头朱成昭垮掉，和大多数造反红卫兵垮掉是相同的。朱成昭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他的家庭不在北京，官职也不是很高，但是有着高干子女所共有的通性——狂妄自大，桀骜不驯。文化大革命从中学到大学最早造反的主要是这些高干子女。朱成昭后来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头头叶向真搞到一起，更是知道了许多中央的内幕，特别是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叶向真是叶剑英的女儿，从小在江青的身边长大，对江青是了如指掌的。朱成昭在知道了一些中央的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之后，彻底动摇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还纠集了身边的少数人，悄然反起了中央文革。不再过问“东方红”的事情，不再参加任何召见和会议。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最后和叶向真一

起逃到了云南，由公安部派了一个副部长抓回来，送进了监狱。叶向真自然是送回家看管起来。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基本都是高干子女组成，也都是同样的下场，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取缔。正是那样，被请出来打鬼的钟馗，最后也是被当作恶鬼，从阎王殿里清除了出去，只能在民间打鬼。这是 1967 年初，“二月逆流”之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大的变化。席卷了一大批的“走资派”被靠边站，挂了起来，更有不少人成了“叛徒、特务、工贼”坐了大牢。保爹保妈派的红卫兵也都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是这样一个结局。打鬼打出了如此多的鬼，文化大革命将是如何收场？

院革委会的第一把手自然是学生首领，是朱成昭的继任者王大宾。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既不是造反的领军人物，也没有受过任何打击和压制，只因为他出身特别贫苦，四川山区里的一个放牛娃，四乡八里唯一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孩子，人并不机灵聪慧，而是非常刻苦用功，只顾学习连班干部都不是。为人非常坦诚老实朴素无华，寡言少语不善言辞，待人随和没有心计。他只是红卫兵的一个小卒，在系里的各战斗队联合起来的推选中，担当起一个小头目，后来全院红卫兵的大联合，又被推上了总部一级。朱成昭垮台以后，许多人更主要是干部和老师，把他怂恿着坐上了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交椅。也是被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召见的地院第一人。成为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其他的四人是：北大“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北航“红旗兵团”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兵团”谭厚兰。聂元梓不是学生红卫兵，是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一个半老徐娘的官太太。只因为她是被毛泽东钦定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署名人，这张大字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五个红卫兵领袖，聂元梓有着深刻背景受康生指使，写出了反对北大校长陆平的大字报，算是文化大革命造反第一人；蒯大富能说会写，清华挑头反校党委，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头号反革命分子；谭厚兰敢想敢干带头造学校党委反，又把矛头直指冲击了高教部，当然是没跑的反革命；韩爱晶更是愣头青，横冲直闯造反，在有国防机密的高校里，绝逃不了镇压的命运。应该说他们四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拼杀出来的勇士，当之

无愧的造反英雄。而唯独地院的王大宾，是在地质学院已经是造反派“东方红”掌权之后，他本身并没有造反拼杀，遭受打击镇压，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地位。他确实不是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具备领导的魄力（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大小领导），他被推到高位的时候，他拒绝过，不敢担当。支持他的人表示绝对保驾，他也是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一些很有能力的老师和干部的辅佐下，把地质学院的管理做得很好。他自知自己的分量，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德，从不狂妄自大，他特别尊重高元贵，要求车队一定按时用轿车接送高元贵上下班，而他自己被召见开会，只坐吉普车。他是以身作则，保持自己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在生活上严格律己，不像有的学校传云：“走了老爷，来了少爷”。这就是地质学院能在 1967 年那样混乱的年代里，仍然安定平稳的关键所在。地质学院的全体红卫兵，都保持着地质学院的优良校风。这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传统影响了几代的地院人，温家宝总理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1967 年尽管地质学院内风平浪静，井井有序，但是社会上的武斗和纷争却是愈演愈烈。七机部“915”“916”两派武斗有打死人的，惊动京城老百姓。有的工厂因为武斗造成停产，例如纺织系统一个工厂少数派被打出工厂，裹挟了当权派跑到地质学院，地院的人出面调解才回厂。文艺团体例如北京京剧团，多数派把少数派打出剧团，四处逃散，不少跑到各大学里。就是中央国家，也出现混乱情况，例如外交部激进派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造成恶劣影响。大学里的武斗最激烈的是北大、清华、人大，武斗是花样别致，简直是创新。北大学生在所控制的楼房顶上安置了大弹弓，用自行车胎绑在固定起来的铁架上，把石块和砖头弹射到对方控制的楼房。人大学生在大操场摆开架势械斗，一方佯装退却，却在地上撒下豆子，进攻方冲过来踩在豆子上，摔得前仰后合，退到一旁的一方哈哈大笑，真是像儿戏一样。清华不愧是理工科大学，把汽车四周焊上铁板像是坦克，开在校园里高音喇叭叫喊着，耀武扬威地向对方示威，任你用砖头砸还是用棍棒打。不过大学里不管怎么胡折腾搞武斗，没有听说有重伤和死人的。大学生们绝对不那么愚蠢，毕竟头脑尚不糊涂，低头不见抬头见，打斗完毕回头还在一个食堂用餐买饭。敌人呼？同学呼？说不清楚。

武斗严重的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例如河北、广西、云南，武斗的双方都有军队插手，表面上是武斗双方抢了军队的军械库，实际上是变相地发枪。武斗升级动用了枪炮子弹，形成割据，几乎是要发展成为内战。中央不是不知道，最初还是任其发展，不管不问。那些上面的人心里清楚，孙猴子不论怎么折腾，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到了1967年7月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放得差不多了，中央喉舌放出了舆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八月一日那天，又是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接着不久中央就发出通知，要向全国各级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同时还要对重要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至此，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大开大放，嘎然而止。不论什么造反派、革命派，此时起，都要循规蹈矩接受管制，老老实实起来。1967年7月底，首先被派进“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是清华大学。“军宣队”是8341部队（中央警卫师），带队的是迟群、谢静宜。这两人他们后来都是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立即宣布各项纪律，所有人员各回各的原班级和原单位。我们学校的“东方红”就有所准备了，首先他们清理了一年多来的，各种宣传材料和所谓的“文件”。院革委会也开了最后的会议，都预感着灾难即将降临了。

地质学院进驻“工宣队”和“军宣队”已是8月下旬了，几乎比清华晚了一个月，这时候的北京高校都进驻了宣传队，是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后来就连中小学也派进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地质学院可能是重点户，“军宣队”是由空军政治学院选派来的，当然在政治力量上是特别加强的。带队的总指挥是空军学院的一个副政委。队员全部是年青的学院政工干部，有少数的老的有系主任，甚至将军级别的，但只是普通队员，据说也是靠边站，跟着来受教育的。“工宣队”是公安部一个制作警具手铐什么的小厂，队员里连车间主任的级别都没有，都是工人，队长只是一个稍老的木工师傅，说话磕磕巴巴，语句不清，文化程度很低。所谓“工宣队”宣传不了什么，只是陪绑。而“军宣队”是真正的全面接管权力的统治者，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瞎扯！就是实行军管，就是要挥舞大棒，

整治！所有这一切又是来自最高指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似乎按兵不动，没有多少动静，实际上是在调查情况，摸排排队，组织力量。党员又重新被启动，当然那些曾为“东方红”竭力效劳的除外。我回忆宣传队来校之后，所采取的的行动，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调查情况，座谈访问，摸底排队，组织基本的依靠对象。第二阶段就是查文化大革命中每人的态度表现，自我交代，背靠背揭发，把文化大革命时，有反动言论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分子挖出来。第三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上查三代，下查所有社会关系，把混入革命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来。第四阶段是“斗私批修”，自我剖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检查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度，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清查和清理中并没有把揪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冲击、造反、砸烂党委当作问题；甚至是对打、砸、抢，等恶劣的暴行不追查、不追究；对制造混乱，浑水摸鱼的“造反”根本不管不问，不理睬。看来还是以保护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任务，防止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宣传队绝对是，坚持执行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方针。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式方法，不是再依靠造反学生，推动文化大革命，而是动用军队保证运动的进行。要从疾风暴雨的运动，转化为深入细致地推进“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使命，完成“防修反修”的大业。

这个由军队政治学院基层政工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实际是工作队，确实有一套整人治人的办法，把管军人的那一套来对付知识分子们。他们分别找每一个人谈话，让你谈自己也谈别人，他们分析捋顺人物间关系，再定性小集团，背靠背揭发，挖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言论。使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反目，甚至使夫妻分裂。达到挖出反文革、反群众运动分子，找到批判对象。他们把学生和老师混合编班一起学习，利用学生去整治老师，因为学生大部分是出身好，阶级立场鲜明，动员学生帮助老师挖阶级根源，批判老师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大力批判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些林彪的忠实门徒，正是在部队里大搞批判“军事挂帅”而兴起的少壮派）。

这些宣传队们，也是推行林彪形式主义的急先锋。除了每天必须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朗读语录，背诵“老三篇”之外，还要每人表忠心，绣忠字旗幅，做忠字礼品。另外在办公室里，教室里贴挂满了“四个伟大”（伟大领袖 伟大导师 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热爱、信仰、忠诚）；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长条横幅。把广场上、马路上的文革政治气氛，全部都转移到了室内，让你一抬头，就映入眼帘里。

从 1967 年 9 月到 1968 年底，军宣队把学校老师和干部们折腾个够，已经再没有什么花样了。学生除了 69、70 两届的还留在了学校，毕业打发了三届的学生。1969 年新学年之后，部分专业课教师带着 69、70 的学生，组成教改小分队出野外、下矿山，进行现场教学。各教改小分队还跟随的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人员，他们实际体验了一下地质工作的野外生活。年轻的宣传队员们，在野外跑不过五十多岁的老教授。下矿井、下机台，干着劳累的生产作业，带实习的老师，还要频频地照顾他们。这些跟着野外教学的宣传队员，亲身经历了地质、矿山的艰辛和劳累，改变了对地质学院知识分子的看法。地质学院的教师不是象牙宝塔里的贵族。

1969 年“军宣队”、“工宣队”撤走了不少人，从上面传下来指示：高等学校、研究单位、部分中央机关，都要外迁搬离北京，学院、地质部联合派人出去选址。同时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教师干部职员们要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们系加部分勘探系的教师干部自组勘探队，带领未毕业的学生，钻探找矿。地质学院的全部教职员工，1969 年底就被分配、调遣，各自准备奔赴所划定的去向。我被圈定去干校，为备战疏散，动员全家一起走，不留下任何物品离开北京。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还在“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而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却已告一段落。当然，学校迁出北京，去干校接受教育，自办勘探队，都是在贯彻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战略。地质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仍在进行中。 ■

此文选自唐国权先生的《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2012 年，自印书）

【书 摘】

## 回忆毛主席的召见，反思对我们的批评

王大宾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主席召见我们5个人的谈话，反思反省自己文革运动中的表现，有这么几点想法。

(1) 不是接见，是召见

对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见我们北京高校五个头头这件事，上节已述，我在地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传达时，将这一见面说成“接见”，视为“是对我们红卫兵的最大最大关怀，最大最大鼓舞，也是我们红卫兵的最大最大光荣，最大最大幸福。”将这次见面时，主旨为严厉批评我们的谈话，仅说成是“对教育革命、执行七三布告、制止清华北大武斗，清华井冈山兵团开枪打死工宣队员，革命大联合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何等幼稚，何等浅薄，竟对毛主席这次谈话后就是我们厄运的开始的真谛混然不觉！

7月28日的见面，不是荣耀、幸福的“接见”，而是挨批、挨训的“召见”。在我传达毛主席见面谈话后的当天下午，丁国钰就给我打来电话，同时也给聂元梓等其他四人打了电话，要求将“接见”改成“召见”。一字之差，反映了毛主席对文革运动初期，曾全力支持过的反工作组造反派红卫兵的态度变化。

时过47年，我看到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谢静宜的回忆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该书176页中写到，毛主席对谢静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主席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揷站起来，气愤地来

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来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主席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气愤的表情说下去：“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主席说这句话时，语气是那样干脆、肯定、有力。

该书又披露了丁国钰给我们电话，要将“接见”改为“召见”，其实是毛主席的指示：“当主席看到传单上讲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的五大领袖时，主席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毛主席在召见我们的五个头头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祇是将这对谢静宜说过的对我们的严厉批评的话，以比较缓和、讨论的方式，恨铁不成钢，失望的心情，当我们的面重复了一遍而已！这就是文革运动发展到1968年7月，毛主席对我们的真实态度，他要结束造反派对他在本阶段，已打破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旧秩序、旧权力系统后，要最后完成新秩序建设，完成新权力系统建设时，已转化为已是起阻碍的作用。而头脑膨胀的我们，当时竟没有一人理解、领会毛主席的批评，没有一人当场表态接受主席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2）面对清华“团派”开枪，学生与工人流血冲突可能进一步激化的危险局面，祇有毛主席亲自出面，才能摆平冲突双方。文革运动发展到1968年7月，已有24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以革命委员会形式、建立新的权力系统的战略部署已处在最后阶段。至9月初，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省区革委会亦可望先后成立。9月5日新疆革委会成立当天，中央即召开大会，宣布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谢静宜的回忆书中披露，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叫她回去，交待任务：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毛主席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



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毛主席预见：“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事前不给蒯大富打招呼。有三万工人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可能会发生流血的预见。这就是毛主席当时事前的思考。

谢静宜忠实执行毛主席交待安排的这一任务，虽有警惕流血的预见，严重的流血事件还是发生了。清华团派以武力抗拒三万工人制止武斗的行动，打死5人，特重伤20多人，较重有一百多人，皮肉轻伤有几百人。

事态的严重性，学生与工人冲突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性，蒯大富当时的表述就已说明。蒯大富当天见到吴德时说：“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就以死一拼！”

蒯大富从吴德处回清华后，对团派各武斗队的指挥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见到吴德。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若不死人，还好办；打死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摆在我们面前的祇有两条路，要么留下校内继续和工人打，要么就是退出清华，别无出路。与会者大多反对逃跑，要与工人拼到底。”

文革运动中，毛主席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导演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运动退出政治舞台。事前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主席事前想好想到的。但冲突局面发展到如此严重，毛主席不得不亲自走到台前。祇有他亲自出面才能安抚摆平双方要拼命和讨还血债的激愤情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常要靠吃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因此睡后的毛泽东是不能轻易去叫醒他的。28号凌晨，不能不叫醒已经入睡的毛主席，从未有过的亲自召见五个学生头头，实在是事态严重紧急。毛主席明确说：“黑手就是么，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来抓我嘛。”听了毛主席这么说，蒯大富他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当时还敢与毛主席派到清华的三万工人对抗吗？

毛主席召见谈话似一盆冷水，让蒯大富及北京高校学生们的情绪慢慢冷静下来。至8月5日，毛主席又借巴基斯坦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工人们被感动了。8月15日，毛主席又在人大会堂分两次接见了进清华的三万多宣传队员。此举标志着工宣队走到文革运动政治舞台的中央，造反派红卫兵退出了文革运动的政治舞台。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5·16”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

### （3）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

文革运动中有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革命。亲历文革运动的我，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真的是搞不清楚的，跟对的是盲从的；没跟上、没有跟、搞反了等种种情形，则是自己头脑膨胀，常常自以为是。毛主席在召见谈话中批评我们：“不要膨胀起来，要冷静嘛！”1967年后，毛主席的总的战略部署我就没有认识，没有紧跟，没有冷静处理，以至在1967年4月，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问题上，发生了地院东方红支持一派群众、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众的严重对抗与肢体冲突，首次引发了北京红代会内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学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与对立，造成极坏的影响。对此事，作为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

1967年6、7、8月，社会上出现的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浪潮，北京发生了如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群众性的极端事件，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干扰他由乱转治、重建新秩序的大局的。事态发展到1967年8月底，毛主席果断地隔离了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对当时的错误浪潮我没有认识，对毛主席处置纠正错误的斗争方向，我不能理解，还在部分群众组织召集的会上发出抱怨。

不但是我，我们这几个头头都没有政治的敏感性与政治智慧，毛主席都转向了，我们的思想还停在过往。毛主席在召见谈话中批评说：“包括蒯大富，现在还搞什么串联会，在和平里、在清华、在北航开会，有广西4·22、大同造反派、广东旗派、辽宁8·31，听北航说，你们还要开国防科委什么会。”

尽管韩爱晶当场辩解说：“那个我不知道。”但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央领导林彪、周总理、江青等人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周总理说：“广西老多，也住在你北航，而国防口，你怎么能去召集开什么会。”江青说：“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质、北大，都做了许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有委托。现在要把他们藏起来，就不对了，他们有的是反对解放军，反对革委会。”

毛主席又批评了1967年9月7日，蒯大富、韩爱晶带人去北师大，支持师大造反兵团颠覆谭厚兰的师大革委会。不是不能抓谭厚兰，但当时是不能抓的。时过境迁，以后不就给谭厚兰扣上“5·16”的帽子照抓不误吗？问题是当时不能抓。毛主席不是要保护谭厚兰，而是要保护刚刚建立的新生革命委员会，不会由此引发各地反对颠覆革委会的连锁反应。对这种政治大局的掌控与处置，我们当年都是不懂的。

#### （4）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说：“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到了1975年、1976年，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中，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1966年，毛主席用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用红卫兵运动、大串联，用蒯大富对抗刘少奇亲自派出王光美坐镇指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这一典型案例，发展到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闹乱了刘少奇在一线掌控的全国上下的权力系统。在这大乱的局面中，毛泽东一直在看，不但在看着聂元梓、蒯大富，也在看着我们，看着文革运动中冒出的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各级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人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动作。他期望在其中选出他认可的接班人，保证他的社会主义路线传至千秋万代。

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文革的实践确实证明我们不行，

正如7·28召见谈话中，江青所说以当时我们的水准与表现，怎能担当治国治天下的大任！

谢静宜回忆书中披露：

1969年3月，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批评与评价：“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么？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自然会承认你的。现在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你们做的事不得人心，无非拿过去谁谁讲话压人。现在群众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很清楚，经文革运动实践检验，毛主席已经不满意我们后来的表现了，毛主席当然“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了，当然也不要我这样的。后来还要用一个清查“5·16”运动，把我们全部清查出去。■

（摘自《王大宾回忆录》151-167 页）

【资 料】

## 薄一波对北京地质学院问题的批示

1966 年 6 月 22 日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 月 22 日

【资 料】

##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sup>1</sup>

1966 年 8 月 17 日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为了彻底完成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务，经《东方红》

---

<sup>1</sup> 此宣言于 1966 年 3 月 17 日在《东方红》公社成立大会上通过。

战斗大队，《红勘联》、《红物联》、《红普联》、《红水联》、《探工战斗联队》、附中《东方红》支队、《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等革命学生组织的民主协商，联合成立《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以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作为纲领，以毛主席的话和党中央的指示作为最高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

《东方红》公社是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革命的党团员为领导核心。《东方红》公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东方红》公社充分发扬民主，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彻底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东方红》公社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革命左派，依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依靠革命的党团员，彻底孤立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经过斗争，最后达到团结 95%以上的干部和 95%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充分揭露他们，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彻底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防止帝修进行颠覆阴谋和实行“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斗争。因此，马马虎虎、模棱两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的作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高度的革命热情，以彻底革命的精神、严肃的科学态度投入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目前这种阻力在我院仍是很顽固的，很强大的，因此《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有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敢字第一、破字当头，做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坚决抵制、批判、斗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旧

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就是暴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造反。造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的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不革命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现在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在今后的斗争中，《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必须自觉地、积极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觉悟，增长才干，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东方红》公社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充分利用大字报这种新式武器，进行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

《东方红》公社认为，“六·二〇”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本院有极深的影响，严重阻碍了本院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了党中央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严重威胁着本院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根本任务的完成。当前关于工作队问题的大辩论，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目前的大辩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

《东方红》公社认为，前本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工作队一手包办产生的，而且一直贯彻着工作队的压制民主、打击革命派的错误路线，已经不能代表本院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意志，已成了本院文化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宣布脱离原院文革的领导。另外，在筹委会成立以前，原院文革委员会只能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讨论，协商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均由原院文革委员会负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东方红报》1967 年 2 月 17 日，第 13 期第二版

---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